



## 【论 文】

# 说民族学

蔡元培

(载 1926 年 12 月《一般》，第 1 卷第 12 号)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曾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民国初年主持制定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评价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代表作有《蔡元培全集》《蔡元培教育论著选》等。

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于记录或比较的学问。偏于记录的，名为记录的民族学，西文大多数作 Ethnographie，而德文又作 Beschreibende Völkerkunde。偏于比较的，西文作 Ethnologie，而德文又作 Vergleichende Völkerkunde。Ethno 源于希腊文的 Ethnos，就是民族。Graphie 源于希腊文的 Graphein，就是记录。Logie 源于希腊文的 Logos，就是学。德文多数民族作 Völker，学作 Kunde，记录作 beschreiben，比较作 vergleichen，所以联合起来成上列的三种名词。但是德文 Völkerkunde 的少数作 Volkskunde，乃从英文的 Folklore 出来。英文这一个名词，是一八四六年顷学者 W. G. Thomas 所创作，用以代通用的 Popular antiquities 的名词，是民俗学的意义。后来渐渐为各国所采用，并无改变；惟有德国人照本国字义改为 Völkerkunde，也惟有德国人用他的民族学多数作为考察各民族文化的学问的总名（英文 Folklore 一字，并无多数字），而又可加以记录、比较等语词。今此篇用民族学为总名，而加以记录的与比较的等词，是依傍德国语法的。

记录的民族学，发端甚早。我国有《山海经》一书，相传为禹益所作，当然不确；然为汉以前的书，是无可疑。这部书固然以地理为主，而且有许多古代神话的材料，但就中很有民族学的记载。例如《山经》，于每章末段，必记自某山以至某山，凡若干里，其神状怎样，其祠礼怎样；那都是记山间居民宗教的状况。他所记神状有龙身人面、人面牛身，与四足一臂、八足二首等语。所记祠礼，用动物，有毛、肥牲、毛牲、百牺、太牢、羊、牝羊、白狗、黑犬、白鸡、雄鸡、雌鸡、毛采等；用糈，有秣米、稷米等；用酒，有酒百尊；用矿物，有玉、璋、璧、珪、瑜、璆等；用器，有烛、铃、兵、桑封、白菅为席等；仪节有瘞、投、祈、禳、斋百日、献血、干舞、冕舞等。而《北山经》之首，记“其山北人皆生食不火之食”；《北次山经》之首，又记“此皆不火食”；又于宗教以外，记及饮食法。《海外经》是各民族的记载，但神话分子太多，就中较为可信的，如记形体，有“结匈国其为人结匈”，“周侥国其为人短小”，“黑齿国其为人黑齿”，“毛民国其为人身生毛”（案：这是虾夷），“劳民国其为人面目手足尽黑”（案：这是非洲黑种）等。记食物，有“黑齿国人，食稻啖蛇”，“玄股国人衣鱼食鼯”等。记服饰，有“周侥国人冠带”，“丈夫国人、君子国人衣冠带剑”等。记品性，有“君子国人好让不争”等。至于《大荒经》，近人颇疑是刘秀等所述，用以释《海外经》的，就中所含民族学的分子，是姓氏与食物两项：如记“胡不与之国，列姓”，“大人之国，厘姓”等。又记“茆国黍食”；“中容人食兽木实”；“盈民之国于姓，黍食”，“又有人方食木叶”，“不死之国，阿姓，甘木是食”；“域民之国，桑姓，射域是食”；“北容之国，食鱼”；“先民之国食谷”；“苗民厘姓食肉”等。这可以算是一部最古而材料较富的书。后来如《史记》有“匈奴”“西南夷”等列传，此后专史，都有这一类的列传。又如唐樊绰的《蛮书》，宋赵汝适的《诸蕃志》，元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明邝露的《赤雅》等等，也算是这一类的专书。但或为好奇心所驱使，或为政略上的副产品，不

能认为科学的记录。在欧洲，自希腊历史家 Herodotus 记埃及人的风俗，罗马的大将撒路记高卢人不列颠人风俗，也是这种记录的开端。此后类似这一类的书，也是很多，然而真正可以认为记录的民俗学的，大抵为十九世纪后半纪以后出版的。因为那时候比较的民俗学已有点成绩；而苦于材料不足，乃先用记录的工作，为比较的预备。现在的记录与从前的不同，就是事实要从实地考查上得来。有时以私人的结合，深入自然民族的部落，经极苦的旅行，冒极大的危险，缘此而牺牲生命的也常有，幸而达到目的，就有一种详确的报告。有时借政府的经费，组织探险队，行大规模的购置与发掘。大约普通的实物，可以购置或交换；通行的传说或歌谣，可由译者解说；外著的风俗，可用照像器摄取；若含有神秘性质的仪式与意义，就不是习他们的语言，知他们的习尚，与他们狎处，决不能窥得真相了。所以每一学者所考察的总不过一部分。我们只要一翻这一类著述的目录，就看得出来。有以地方为范围的，如 Erekert<sup>①</sup>的高加索与其各民族；Brunentritt 的斐列滨<sup>②</sup>民族记的一种试验等是。有以一或数民族为范围的，如 Haarhoff<sup>③</sup>的南非之 Bantu<sup>④</sup>族，Steinen<sup>⑤</sup>的巴西中部之自然民族等是。有以一器物为范围的，如 Ankesmann<sup>⑥</sup>的非洲人之乐器，Woule<sup>⑦</sup>的非洲人之箭等是。有以一事件为范围的，如 Sarfert<sup>⑧</sup>的北美土人之家屋与村落，Weddell<sup>⑨</sup>的西藏之佛教等是。有以一洲的普通文化为范围的，如 Ankesmann 的非洲之文化范围与现象，Graebner<sup>⑩</sup>的南洋之文化范围与现实等是。关于合各洲各民族而汇集前人的记录以成书，如 Euschan<sup>⑪</sup>所印的，乃集众编成的，除 Euschan 自任澳洲与南洋外，欧亚二洲，属于 Byhan<sup>⑫</sup>，美洲属于 Krieger<sup>⑬</sup>，非洲属于 Euschan，绪言属于 Lasch<sup>⑭</sup>。可以见得不是容易的事业了。

比较的民族学是举各民族物质上行为上各种形态而比较他们的异同。异的，要考究他们所以不同的缘故：是否由于地产、气候、交通的影响，抑民族特性的差别？是否因进化阶级上所占的时期不同？抑或表面不同而实含有一种共通的原则？同的，又要考究他们是否因地域相近，而一方面乃出于模仿，究竟那一族是先驱者？是否彼此本在同地，后来因被他族的割裂而渐遁渐远？是否甲、丙两民族本由中间乙民族的媒介而输入一种文化，但乙民族不复保存而甲族或丙族尚留存着输入的痕迹？是否彼此均不相干而进化上必经的阶级？这都是比较上应有的问题。吾国古人，也未尝没有见到，例如《小戴记·王制》篇：“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各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

这一段于民族上仅浑举五方，于安居上举穴居，于和味上举不火食，不粒食；于宜服上举衣皮，衣羽毛，又举被发，文身，雕题，交趾等特别装饰，固太简略。所谓性不可移，也与现代实验上不合。但当时已知道用寄、译等作达志、通欲的工具，且于修齐政治教育而外，不主张易其宜俗，也可算很有见地了。《小戴记》又有一条，说禽兽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也知家庭历史，不止父系一制；但不知人类中自有母系一制，所以把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专属于禽兽。此外各书，类似这两条的判断，当然还有许多；但因为没有根据详确的记录，经过很精细的研究，所以不能认为比较民族学上适合的材料。现今欧洲比较民族学部类，照 Woule 氏所列举的，是一，人群的起源与最早形式，二，经济的起源与最早形式，又分为：甲、经济的形式，乙、消遣品，丙、工艺与商贾，丁、钱；三，物质的文化，又分为：甲、机械，乙，取火具，丙、武器与工具，丁、装饰与衣服，戊、建筑，己、交通与运输；四，精神的文化，又分为：甲、语言，乙、文字，丙、美术，丁、游戏与玩具，戊、宗教，己、丧仪。关于这一类的著作，说人群形式的，有 Bachofen<sup>⑮</sup>的母系制，Morgan<sup>⑯</sup>的最初的社会，Starke<sup>⑰</sup>的最初家庭等等。说经济的有 Bucher<sup>⑱</sup>的民族经济的起源，Schurtz<sup>⑲</sup>的钱的原理与发明史等等。

说物质文化的有 Andree<sup>⑳</sup>的自然民族所用的金类，Yahn<sup>㉑</sup>的古代攻击兵器的进化史，Klemm<sup>㉒</sup>的工具与武器等等。说精神文化的，有 Geiger<sup>㉓</sup>的人类语言与理性起源与进化，Mallery<sup>㉔</sup>的美洲印度人的象形文，Palfour<sup>㉕</sup>的装饰术的进化，Grosse<sup>㉖</sup>的美术的起源，Groos<sup>㉗</sup>的人类的游戏，Roskoff<sup>㉘</sup>的自然民族的宗族状况，Schurtz 的偶像教，Preuss<sup>㉙</sup>的美洲东北亚洲的葬法等等。至于统合各部的著作，也有 Andree 的民族学的平行观与比较观，Froperuins<sup>㉚</sup>的写示特性的民族学，Schurtz 的文化的起源史，Woule 的无文化者的文化等等。

**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关系** 人类学是以动物学的眼光观察人类全体，求他的生理上、心理上与其他动物的异同，势不能不对于人类各族互有异同的要点，加以注意。似乎人类学有可以包含民族学的倾向，所以从前学者，也或用 Anthropology（人类学）作民族学的名。然现今民族学注重于各民族文化的异同，头绪纷繁，决不是人类学所能收容，久已离人类学而独立。但是民族学中对于各民族生理上的特征，如身体的短长，头骨的尺度，肤色的明暗等，仍用人类学的方法，这是民族学包含人类学份子的。

**民族学与人种学的关系** 人种学是研究人类种族的差别、分布与混杂的情形，德文上有 Rassenkunde 专名，而他国多用 Ethnologie 一字，所以词典中往往用人种学来注释这个字。但是人种学虽也要考求各民族的文化，却不过借以证明他们的种系的异同，对于文化本体不是主要目的物，而所详求的还是偏于种系方面。民族学因为要明了文化上互相传演的机会，自然也不能不注意于种系的相关；而对于种系的异同，却不是主要目的物；而所详求的，还是偏于文化方面。这是两方互相交错，而又各有领域的缘故。

**民族学与考古学的关系** 考古学西文作 Archaeology，因为所考的古物，偏于有史以前的时代，所以一名先史学（Prehistoric）。考古学者所得的材料，均为实质的，例如人骨、兽骨及其他器物之类，用民族学所得的材料来证明他，才能知道详细的作用，且因此而知道现代开化人的祖先，正与现代的野蛮人相等。

各民族占地的态度，迁徙踪迹，经济的来源与文化传布的范围，都与地理有关，所以从前民族学家如 F.Ratzel<sup>㉛</sup>、G.Gerland<sup>㉜</sup>等均均为地理学者，这可以见民族学与地理学的关系。

**民族的文化随时代而进步** 研究民族者不能不注意于此点，所以 H. Schurtz 目民族学为文化的原始史。W. Schmidt<sup>㉝</sup>谓“民族学是以由各民族生活上求出人类精神的发展与其由精神上所产生的行动为对象，即不外历史学的研究”。Ratzel 亦谓“民族学在各种纪念品上认识人类精神的进化与社会的变迁，得视为历史学之一部”。这就可以见民族学与历史学的关系。

民族学中本有关于社会进化的一部，英国斯宾塞所著《社会学原理》，法国涂尔干一派的社会学，所列例证，都出于民族学，这可以见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关系。

民族学的材料，固然有一部分属于自然科学范围，而大部分是关于各民族的心理，所以德国冯德有“民族心理学的建设”，这可以见民族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其他与言语学、经济学、美术史、文学等均有关系之点，可以类推。

在民族学初发起的时候，欧人所考察的，大半是他们本国属地的民族。一方面固然出于求知的欲望，而另一方面，也总觉得这些民族的文化，与己国相去太远，当然是劣等民族，不妨受高等民族的压制。后来因时相接近，或且通他们的言语，知道他们的历史，往往化去了优劣的差别见，而引起同情。例如初民的手工艺品，当然不及机制品的精整，然而认手工有表现个性的特长。初民的美术品当然多不合于写实的条件，然而表现主观的姿势，乃为现代表现派所采取。初民的音乐，固多不合于声学的条件，然而现代大音乐家有以善用“不和声”见长的，因而初民的音乐，也受注意。初民的社会，固多诡异的形式，然而有几种是为文化民族的祖先所有的，遂被认为文化史上经过的阶级。初民有魔术与宗教的迷信，固然科学家所鄙薄，然而科学最发达的欧洲，乡

愚保存这类迷信的，也还不少，现在幽灵学也为科学家研究的对象了。所以民族学发达以后，对于世道人心的裨益，亦复不小。

至于中国历史上断片的事实，因吾国先史学尚未发展的缘故，一时不易证明的，于民族学得了几种旁证，可以明了一点的，也就不少。姑举几个例：如《易·系辞传》称上古穴居，而别史又有有巢氏的时代。古人穴居的遗迹，法兰西、西班牙等国现已发见多处，在我国必不难觅得。巢居的状况，于 Neuguinea 土人中尚可以看到。相传吾国有燧人氏时代，方知用火，而周代尚有钻燧取火的习惯，但这类的器具，已经消灭了，而现今未开化民族中如南美洲的 Ganchos，北美洲的 Eskimo、Troksen，亚洲的 Malai，澳洲土人等，都还有钻木取火的装置。《易》称“上古结绳而治”，注家但说“大事大结其绳，小事小结其绳”，不知道结的形式与作用；而美洲墨西哥、秘鲁两国的土著人，都曾有过结绳的时代。墨西哥的绳文，虽尚未觅得；而秘鲁的绳文，流传尚多，且有专门研究的。近有一瑞典大学教授，认为结绳皆记数，而且多为配一年中之日数的。

《诗》“生民篇”称周朝的始祖是姜嫄，“玄鸟篇”称商朝的始祖是有妣，都是妇人；又古代姓先于氏，而姓字从女，在习惯于父系制家庭的吾人，很不易知道他的缘故。在民族学考得初民族父系制以前，先有一个母系制的时代，就可以知道以妇人为始祖的缘故了。《左氏传》述郯子语古代有以龙名官，以鸟名官的帝王。《说文解字》说重闽皆蛇种，故从虫，北狄犬种，故从犬，用民族学的眼光看起来，都是图腾（Totemismus）的遗迹。最可异的，东方的夷，独从人；现今美洲北部的 Eskimo 民族，虽被人用 Algonkin 语名为“食生肉”的民族，而自称 Tunit 乃“人”的意义。此族体格状貌近于蒙古族，故有人疑为自亚洲渡白零海峡，始到美洲的。或者有一时期，这民族的一部分，适在汉族的东面，所以名他为夷，而夷字特从人。其余可以证明中国史迹的，一定很多，就在乎对于民族学有兴会的人，随时去考求了。

文献来源：

- ① Erekert: 伊拉克特。
- ② Brunentritt: 布隆彻德。斐列滨，今译为菲律宾。
- ③ Haarhoff: 哈尔荷夫。
- ④ Bantu: 班图。
- ⑤ Steinen: 斯代因。
- ⑥ Ankesmann: 安基斯曼。
- ⑦ Woule: 芜尔。
- ⑧ Sarfert: 沙法特。
- ⑨ Weddell: 韦德尔。
- ⑩ Graebner: 格雷布奈。
- ⑪ Euschan: 尤善。
- ⑫ Byhan: 拜含。
- ⑬ Kriekerberg: 克立格伯克。
- ⑭ Lasch: 拉许。
- ⑮ Bachofen: 巴可芬。
- ⑯ Morgan: 摩尔根(1818-1881)，美国民族学家和原始社会历史学家。著有《古代社会》。
- ⑰ Starke: 司塔克。
- ⑱ Bucher: 伯芝尔。
- ⑲ Schurtz: 叔尔兹。
- ⑳ Andree: 安椎。

- ⑳ Yahn: 颜。
- ㉑ Klemm: 克勒姆
- ㉒ Geiger: 格克尔。
- ㉓ Mallery: 麦来勒。
- ㉔ Palfour: 巴货。
- ㉕ Grosse: 格罗塞。
- ㉖ Groos: 谷鲁斯。
- ㉗ Roskoff: 罗斯可夫。
- ㉘ Preuss: 柏卢斯。
- ㉙ Froperuins: 佛罗伯鲁因。
- ㉚ F.Ratzel: 拉采尔(1884-1904), 德国人文地理学家, 著有《人类地理学》。
- ㉛ G.Gerland: 格兰特。
- ㉜ W.Schmidt: 施密特(1868-1954), 德国民族学家, 著有《近代民族学及其起源、性质和目的》

## 【论 文】

### 半月形文化带：理解中国民族及历史脉络的一把钥匙<sup>1</sup>

——童恩正“半月形文化带”的学术意义与价值

石 硕<sup>2</sup>

**摘要：**“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是童恩正依据考古材料，提出的一条从中国东北到西南的地理文化带。长期以来，对半月形文化带的意义与价值，学界虽有所涉及，但总体上缺乏将其置于中国历史及民族活动框架中，系统考察其与历史上民族活动的内在关联性。事实上，半月形文化带不但被历史时期民族活动所充分印证，且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进程中起了关键性连接作用。半月形文化带不仅为我们认识中国文明起源开辟了新视野，同时北方游牧民族在该地带上的承袭性和文化融合以及对农耕区域的包裹性，均构成了中国历史的重要特点。半月形文化带有助于我们摆脱把长城作为农、牧线性分割的认知和多从单一民族视角认识北方民族与华夏农耕民族关系的窠臼，更多看到北方民族在中国历史中的交融连接及文化整体性，从而为我们深入认识理解历史上游牧民族同农耕民族之间的互动整合以及中华民族历史脉络提供了一个新的整体性视野和思路。半月形文化带蕴含着中国历史、考古、民族、地理、语言、生态和人类学的丰富内涵，堪称理解中国民族和历史脉络的一把钥匙。

**关键词：**半月形文化带；童恩正；北方游牧民族；农牧结合带

---

<sup>1</sup> 本文刊载于《清华大学学报》2024年第2期，第68-82页。

<sup>2</sup> 作者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在中国人文地理领域，有两个概念影响较大，一是“胡焕庸线”<sup>1</sup>，二是童恩正提出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二者的共同点均是“从中国东北到西南”。与“胡焕庸线”相比，“半月形文化带”的影响主要限于学术界，不如“胡焕庸线”那样广为人知。原因是“胡焕庸线”是一条直线，简洁、明了，且线的东、西两边呈现的巨大反差让人易于理解，更易被接受。童恩正是考古学家，他是依据考古材料提出“半月形文化带”<sup>2</sup>。考古学专业性较强，非专业人士阅读考古论文往往较为困难。但以上这些只是表面原因。根本原因是，同“胡焕庸线”相比，“半月形文化带”的内涵更复杂、更丰富，牵涉面也更广。因此，要充分认识“半月形文化带”的意义和价值，不但需要对中国历史、民族有宏观和整体性认识，更需要历史、考古、民族、地理、人类学、生态学等综合的学科视野。囿于此，目前学界对半月形文化带的认识尚不充分，对其与历史上民族活动的内在关联性亦缺乏足够重视。这是一个较大缺陷。为此，本文拟从中国文明的起源、民族活动、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等视角，试对半月形文化带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做一讨论，旨在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相关认识。

## 一、一个基于考古材料的重要发现

童恩正以西南考古研究见长。这突出体现于他在西南石棺葬、大石墓—石棚遗迹、细石器、青铜器及西藏考古等方面做出的一系列前沿性研究<sup>3</sup>。在上述研究基础上，童恩正发现一个重要现象：西南地区考古文化中存在大量北方草原文化因素<sup>4</sup>。西南地区为什么出现如此众多的北方草原文化因素？为弄清此问题，童恩正分别将西南地区的细石器、石棺葬、大石墓—石棚以及众多典型器物等置于更大的地域空间、置于从中国东北到西南的漫长地理带中进行系统、全面考察。考察之后惊奇地发现，上述遗迹遗物在从东北到西南的整个地理带中均普遍存在。这显然已不能用“‘偶合’来解释”<sup>5</sup>。在此基础上，童恩正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在我国从东北至西南存在着一条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自提出迄今，已过去 37 年。这期间，学术界已愈来愈意识到“半月形文化带”的重要意义和价值<sup>6</sup>。今天，当我们审视这份学术遗产，不得不由衷钦佩童恩正提出“半月形文化带”的远见卓识。童恩正对半月形文化带的论述与阐释，有两点给我们以深刻启示：

### (一)透物见人：从考古文化透视背后的民族与社会

童恩正从经济类型的共同性和民族集团的流动迁徙，来阐释半月形文化带存在大量相似考古文化的原因。如他将东北地区石棺葬的分布划分为吉林省境内、辽宁省西部、河北省北部、辽河

<sup>1</sup> “胡焕庸线”是地理学家胡焕庸于 1935 年划出的一条从东北瑷珲到云南腾冲的中国人口密度分界线。参见胡焕庸：《中国人口之分布——附统计表与密度图》，《地理学报》（南京）1935 年第 2 期，第 33-74 页。

<sup>2</sup>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见文物出版社编辑部编：《文物与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6 年，第 17-43 页。该文被认为是童恩正“长期从事西南考古的集大成之作”。参见李水城：《文史双馨、学贯中西：记考古学家童恩正》，《中国文化》2021 年第 1 期，第 395 页。

<sup>3</sup> 童恩正在西南地区石棺葬、大石墓、青铜器等诸多领域均有卓越开拓与建树，并主持卡若遗址的发掘，这是新中国以来在西藏进行的首次科学发掘。

<sup>4</sup> 童恩正早在 1973 年就指出，西南“石棺葬的建造者所表现的文化……带有极清晰的北方草原地区文化的色彩”。参见冯汉骥、童恩正：《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考古学报》1973 年第 2 期，第 41-60 页。

<sup>5</sup>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见文物出版社编辑部编：《文物与考古论集》，第 17 页。

<sup>6</sup> 2009 年，该文被收入《中国考古人类学百年文选》；2012 年，第五届东亚考古协会（SEAA）世界会议为纪念童恩正，设置了以“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为讨论主题的分会场；2019 年，该文被收入《中国考古学经典精读》一书，影响至今，盛行不衰。分别参见王仁湘主编：《中国考古人类学百年文选》，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9 年，第 191-231 页；Anke Hein, Introduction: Diffusionism, Migration, and the Archaeology of the Chinese Border Regions, Anke Hein ed., The “Crescent-Shaped Cultural-Communication Belt”: Tong Enzhen’s Model in Retrospect, Oxford: Archaeopress, 2014, pp.1-17；李伯谦、陈星灿主编：《中国考古学经典精读》，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年，第 111-150 页。

以东四个亚区，从文献记载看，它们分别与古代肃慎、东胡、山戎、东夷等民族集团有关<sup>1</sup>。在对半月形文化带的石棺葬做整体性考察基础上，童恩正指出：“就现有资料而言，发现的石棺葬以西北地区最早，西南次之，东北又次之。这三个大区虽然相隔甚远，但石棺的结构却惊人地相似。我们似有理由可以推测，石棺原为黄河上游某一氏羌系统的民族(其中以氏族的可能性较大)所采用的一种葬具，以后才传播到‘西南夷’和东北的‘胡’、‘戎’诸民族中去的。”<sup>2</sup>换言之，经济类型相似的不同民族集团的迁徙交流，正是半月形文化带中产生诸多共同文化因素的重要原因。

在此之前，一些学者已注意到西南地区存在的北方草原文化因素，正如童恩正指出：“关于滇文化中存在以动物纹饰为代表的北方草原民族的因素，这一点早为国外学者所注意。如最早研究滇文化的美国学者哈斯金斯(J. F. Haskins)、西德学者德麦玲(Magdalene von Dewall)、日本学者白鸟芳郎等均曾论及此事，但是由于他们没有看到这一边地文化传播带的存在，所以难于正确解释其来源。”<sup>3</sup>经济类型的相似性，正是合理解释半月形文化带中存在大量相同考古文化因素的依据。这种共同文化因素，“既有族群的迁徙流布、民族的融合交往，也有间接的观念传播等”<sup>4</sup>。童恩正认为：“从东北至西南成一半月形环绕着中原大地，但是从新石器时代后期直至铜器时代，活动于这一区域之内的为数众多的民族却留下了若干共同的文化因素。”<sup>5</sup>由考古文化透视背后的民族活动、社会状况与文化交流，正是解释半月形文化带存在大量相同文化因素的关键。

## (二)从生态和地理环境角度阐释半月形文化带的成因

从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形文化带大体呈现45度倾斜(这与“胡焕庸线”相类似)，南北和东西跨度达万余里，其宽度大约在100公里-300公里。如果说不同民族集团的文化交流和流动迁徙是造成该地带存在大量相似文化因素的原因<sup>6</sup>，那么，在南北和东西跨度如此之大的地理带上，为何会发生如此频繁的民族迁徙流动与文化交流？童恩正在对半月形文化带地理生态环境做深入研究后，以敏锐的洞察力发现半月形文化带生态环境呈现极大一致性的关键，是存在“纬度高地形低、地形高纬度低的互为补偿的自然条件”。对此，童恩正曾作如下论述：

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主要地貌为山地或高原，平均海拔在1000—3500米。大致而言，从大兴安岭南段及西辽河平原，经锡林郭勒高原至鄂尔多斯一线，即北纬40度附近，海拔为1000—1500米；在六盘山以西，黄河上游河湟一带，即北纬37度附近，黄土高原的高度在2000米左右；而在青藏高原的东南部，北纬33度至26度之间，平均高度在3000米以上。这也就是说，从东北到西南，半月形地带的高度呈阶梯状递增，呈现出一种纬度高地形低、地形高纬度低的互为补偿的自然条件。这就使本地区的太阳辐射、气温、降水量、湿润程度、植物生长期、动植物资源等方面，均具有相当的一致性。<sup>7</sup>

<sup>1</sup>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见文物出版社编辑部编：《文物与考古论集》，第20-23页。

<sup>2</sup>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见文物出版社编辑部编：《文物与考古论集》，第23页。

<sup>3</sup>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见文物出版社编辑部编：《文物与考古论集》，第28-29页。

<sup>4</sup> 李水城：《文史双馨、学贯中西：记考古学家童恩正》，《中国文化》2021年第1期，第396页。

<sup>5</sup>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见文物出版社编辑部编：《文物与考古论集》，第17页。

<sup>6</sup> 例如，细石器的产生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通常是在草原、沙漠、高原地区及与其邻接地带产生的。参见安志敏：《细石器文化》，《考古通讯》1957年第2期，第36-48页。

<sup>7</sup>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见文物出版社编辑部编：《文物与考古论集》，第32页。

也就是说，从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形文化带，纬度虽逐步降低、但海拔却逐级上升，因纬度与海拔的相互补偿，造成该地带太阳辐射、气温、降水量、湿润程度、植物生长期、动植物资源呈现高度一致性。童恩正指出，生态环境高度一致正是造成该地带民族流动迁徙和文化交流频繁，从而出现大量相同考古文化因素的原因。

从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形文化带，揭示了历史上北方民族迁徙流动的一个重要地理文化现象。童恩正不但提出半月形文化带，还以开阔的思路和多学科视野与方法，将考古材料置于历史、民族与生态环境等综合因素进行考察，揭示了半月形文化带赖以产生的地理生态环境机制与社会文化背景。这种多学科视野与研究范式，在 20 世纪 80 年代颇具开拓性和引领性。有学者曾对其提出半月形文化带的论文作如下评论：

该文论据充分，言之成理，令人耳目一新，全面体现了童恩正将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生态学等方法结合的治学特点，以出土文物为基础，既有宏观的视野，也有微观的考证，多角度认识和复原古代民族和社会。<sup>1</sup>

半月形文化带不但提供了认识古代民族活动的新视野，其立论思路和研究范式上的开拓、创新也显而易见。

## 二、半月形文化带为历史时期民族活动所充分印证

童恩正提出半月形文化带的依据，是新石器时代后期至青铜时代的考古材料，时代下限止于春秋战国，未涉及春秋战国以后的情况。考古学是实证性极强的学科，强调用材料“说话”。童恩正对半月形文化带的讨论，体现了用考古材料“说话”的严谨态度。那么，在春秋战国以后，半月形文化带在中国历史演变与民族活动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处于何种地位？这些问题直接关涉对半月形文化带学术价值的判定。

童恩正曾明确指出：“在这半月形的地带之内，一直是畜牧或半农半牧的民族繁衍生息的场所。”<sup>2</sup>这表明，童恩正对活动于半月形文化带的人群面貌有一个清晰判断——他们主要属于“畜牧或半农半牧的民族”。事实上，春秋战国以后，半月形文化带一直是中国历史上最活跃、民族流动最为频繁的地理区域，而活动于这一区域的民族，正是游牧或半农半牧民族。最早沿半月形文化带流动迁徙的，是受秦挤压西迁的羌人。《后汉书·西羌传》记：

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戎。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犍牛种，越嵩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sup>3</sup>

赐支河指今黄河上游<sup>4</sup>。这支在公元前 4 世纪“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的羌人，显然进入青藏高原，成为吐蕃先民之一。《新唐书·吐蕃传》记：

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还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鹑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或曰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二子，曰樊尼，曰儁檀。儁檀嗣，为乞佛炽盘所灭。樊尼挈残部臣沮渠蒙逊，以为临松太守。蒙逊灭，樊尼率兵西济河，逾积石，遂抚有群羌云。<sup>5</sup>

<sup>1</sup> 李水城：《文史双馨、学贯中西：记考古学家童恩正》，《中国文化》2021 年第 1 期，第 396 页。

<sup>2</sup>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见文物出版社编辑部编：《文物与考古论集》，第 34 页。

<sup>3</sup>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5 年，第 2875-2876 页。

<sup>4</sup> 张广大：《析（赐）支河曲之地望考略》，《西北民族研究》1990 年第 2 期，第 241-244 页。

<sup>5</sup> 《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上》，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第 6071 页。

据此记载，吐蕃祖源一是与古羌人有关，二是与南凉有关。南凉是鲜卑慕容所建政权，从南凉“樊尼率兵西济河，逾积石，遂抚有群羌云”看，西藏高原的古老居民当是“群羌”，并混有鲜卑成分，二者均是沿半月形文化带西迁的民族。

西迁羌人除进入今西藏外，也向南流布于青藏高原东缘的横断山区，“或为鼈牛种，越嵩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sup>1</sup>。《隋书》记川西高原部落时云：“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卫，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台，春桑，利豆，迷桑，婢药，大硖，白兰，叱利摸徒，那鄂，当迷，渠步，桑悟，千碉，并在深山穷谷，无大君长。其风俗略同于党项，或役属吐谷浑，或附附国。”<sup>2</sup>新旧《唐书》在记载青藏高原党项、白兰、东女等部落时，均称其为“羌之别种”<sup>3</sup>。可见，羌人曾沿半月形文化带向西、向南流动，大范围地散布于青藏高原及横断山脉地区。

继羌人之后，沿半月形文化带流动的另一北方民族是源于辽东的鲜卑。魏晋十六国时期，鲜卑慕容、拓跋两部开始大规模从东北、蒙古草原南下。南下的鲜卑先后建立了代、前燕、西燕、后燕、南燕、西秦、南凉等政权，为“五胡”中建立政权最多的北方民族。值得注意的是，慕容鲜卑沿半月形文化带向西流动，进入西北和青藏高原范围，先后建立西秦、南凉和吐谷浑三个政权<sup>4</sup>。其中，慕容鲜卑所建吐谷浑政权，立国达三百余年，统治今甘南、川西北和青海氏、羌等族，势力鼎盛时其疆域东起今甘肃南部、川西北，南达青海南部，西至今新疆若羌、且末，北隔祁连山与河西走廊相接。公元663年为吐蕃所灭。吐谷浑后与藏、蒙等民族融合，成为今土族的主要来源<sup>5</sup>。今青海都兰血渭一号墓，即反映吐谷浑上层贵族的生活面貌。<sup>6</sup>

宋、辽、金、西夏时期，半月形文化带上的民族流动与文化交流最典型的要数西夏与西辽。西夏是党项人建立的政权，处于农牧交接的半月形文化带。西夏疆域范围包括今宁夏、甘肃、青海东北、内蒙古西部及陕西北部地区。西夏不仅成为半月形文化带中西北、西南、北方草原与中原沟通联系的枢纽，也成为羌、藏、契丹、女真、汉等各民族及文化发生密切接触交流的区域<sup>7</sup>。如西夏人信奉藏传佛教，导致大量西藏僧人前往西夏，也促成西夏与青藏高原地区的广泛交流<sup>8</sup>。西夏与北宋之间进行的战争，导致其对中原文化的大量吸纳，产生了仿汉字的西夏文<sup>9</sup>。西夏立国189年，既是对农牧结合地带之民族与文化的一个强有力整合，也促进了半月形文化带与中原地区之间的民族与文化交流。<sup>10</sup>

辽朝是契丹人建立的王朝，兴起于大兴安岭一带，其疆域东至日本海，西至阿尔泰山，北到外兴安岭一带，辽长期占据华北平原北部的燕云十六州一带，其南境至河北中部白沟河、雁门关一带与北宋形成对峙<sup>11</sup>。辽的疆域范围主要处于半月形文化带。辽立国210年，同样是对半月形文化带之民族与文化的一个强有力政治整合。1125年，金灭辽，辽之余部同样沿长城一带向

<sup>1</sup>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2876页。

<sup>2</sup> 《隋书》卷八三《附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859页。

<sup>3</sup>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90-5292页；《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传上》，第6214-6215页。

<sup>4</sup> 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176-183页。

<sup>5</sup> 周伟洲：《吐谷浑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0页。

<sup>6</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都兰县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考古》2021年第8期，第45-70页。

<sup>7</sup> 史金波：《论西夏对中国的认同》，《民族研究》2020年第4期，第103-115页；吴天墀：《西夏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83-291页。

<sup>8</sup> 史金波：《西夏的藏传佛教》，《中国藏学》2002年第1期，第33-49页。

<sup>9</sup> 史金波：《西夏文概述》，见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43页。

<sup>10</sup> 舒振邦：《西夏的内徙及其与中原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第100-106页。

<sup>11</sup> 舒焚：《辽史稿》，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5-138页。

西流动迁徙，于1132年在西域地区建立西辽<sup>1</sup>。西辽虽主要活动于西域和中亚地区，但同青藏高原地区的部落和地方势力之间有诸多交往，史籍有不少关于西辽与吐蕃之间往来的记载<sup>2</sup>。契丹的余部也曾沿横断山脉地区南下，进入云南保山、临沧、大理、西双版纳等地，特别是保山施甸县的契丹后裔为数甚众，改汉姓、编修族谱，建立宗族组织<sup>3</sup>。

中国历史上，北方民族沿半月形文化带向西南流动最典型的例证，无疑要算蒙古。蒙古兴起于大兴安岭地区，因兼并北方草原各部而崛起、壮大，是集北方游牧民族之大成的一个民族<sup>4</sup>。青藏高原纳入中原政治体系，主要是通过蒙古入主中原并建立的元朝来实现的<sup>5</sup>。在此过程中，蒙古正是通过从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形文化带，同西南及青藏高原地区发生密切联系。自13世纪以来尤其是明末清初，蒙古各部源源不断地南下青海，导致蒙藏之间以宗教为连接纽带的大规模结合，从而对整个中国北方地域的政治、文化与民族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北方游牧民族为何总是规律性地沿半月形文化带从东北向西南流动迁徙，翦伯赞曾有如下论述：

大多数的游牧民族都是由东而西走上历史舞台。现在问题很明白了，那就是因为内蒙东部有一个呼伦贝尔草原。假如整个内蒙是游牧民族的历史舞台，那么这个草原就是这个历史舞台的后台。很多的游牧民族都是在呼伦贝尔草原打扮好了，或者说在这个草原里准备好了，然后才走出马门。当他们走出马门的时候，他们已经不仅是一群牧人，而是有组织的全副武装了的骑手、战士。这些牧人、骑手或战士总想把万里长城打破一个缺口，走进黄河流域……如果这些游牧民族，在阴山也站不住脚，他们就只有继续往西走，试图从居延打开一条通路进入洮河流域或青海草原；如果这种企图又失败了，他们就只有跑到准噶尔高原，从天山东麓打进新疆南部。<sup>6</sup>

这段论述勾勒出北方游牧民族规律性从东北向西迁徙流动的现象及原因，也清晰地道出了一个地理带的存在，即北方游牧民族沿长城外围一侧从东北向西南流动的地理带，其主体部分正是半月形文化带。《史记》在记叙“冠带战国七”即华夏边缘时，曾明确提到“因边山险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所言“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sup>7</sup>，正属于半月形文化带范围。

很显然，历史时期北方民族的活动，确凿印证了“半月形文化带”的存在。这条地理文化带不但存在于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在其后历史时期，这条以“畜牧或半农半牧的民族”为主导并紧紧环抱着中原农耕区域的半月形文化带，始终发挥着重要的连接作用。

### 三、半月形文化带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连接作用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很大程度是北方游牧与华夏农耕两大民族系统之间冲突、竞争、交流、融合并逐渐整合为一体的结果。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半月形文化带发挥了关键性的连接作用，可谓功莫大焉。

<sup>1</sup> 邓锐龄：《西辽疆域浅释》，《民族研究》1980年第2期，第31-38页。

<sup>2</sup> 陈庆英、白丽娜：《宋代西北吐蕃与甘州回鹘、辽朝、西夏的关系》，《西藏研究》2013年第5期，第9-18页。

<sup>3</sup> 杨毓骧：《云南契丹后裔考说》，《思想战线》1994年第2期，第60-67页；杨毓骧：《云南契丹后裔的宗族组织》，《北方文物》1998年第4期，第55-60页。

<sup>4</sup> 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见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元史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85-423页。

<sup>5</sup> 石硕：《蒙古在连结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中的作用》，《西藏研究》1993年第4期，第87-95页。

<sup>6</sup> 翦伯赞：《内蒙访古》，《人民日报》1961年12月13日，第5版。

<sup>7</sup>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86页。

半月形文化带的连接作用，最显著的体现，是13世纪—18世纪蒙古通过这一地理文化带，将中国西南地区同整个北方地域逐渐连接为一体，对最终框定中华民族地域格局起了决定性作用。13世纪，蒙古建立的元朝首次将青藏高原地区纳入中原王朝政治体系<sup>1</sup>。元朝不仅在西藏派驻军队，清查户口，将青藏高原划分为三个行政区<sup>2</sup>，还建立起从元大都通往西藏的驿站系统，驿站系统穿越的地区正是半月形文化带<sup>3</sup>。不过，在元朝统治西藏过程中，发生的更具决定性和影响深远的事件，是以八思巴为代表的西藏教派势力对元朝统治者进行的强有力的宗教渗透和影响，使元朝统治者普遍信奉藏传佛教并确立了以西藏僧人担任“帝师”的制度<sup>4</sup>。由于元皇室集团、王公贵族信奉并大力推崇藏传佛教，西藏僧人纷纷前往大都，投奔于皇室及王公贵族门下，从事传教、做法事等宗教活动。所以，在元朝统治西藏过程中，西藏教派势力可谓在宗教上征服了元朝统治集团。双方在政治和宗教上的紧密结合，一方面使西藏宗教势力依靠中央王朝扶持发展的趋势得以形成，同时开启了影响此后中国北方地域政治走向的一个重要格局——揭开了蒙藏之间以宗教为连接纽带的政治结合之序幕<sup>5</sup>。蒙藏发生大规模结合的文化与地理基础，正是半月形文化带。

元朝灭亡后，被称作“北元”的蒙古势力退回草原，为争夺汗位，蒙古逐渐分裂为东、西两部。明中叶“土木堡事变”后，明朝元气大伤，边防日渐松弛，加速了蒙古在北方地域的扩张，亦为蒙、藏之间的大规模结合创造了条件。自明中叶起，东蒙古各部陆续向西南迁移，首先沿半月形文化带进入河套地区游牧，时称“套虏”<sup>6</sup>，后陆续沿半月形文化带南下青海，以青海草原为驻牧地，同时向西藏和横断山脉地区扩展势力<sup>7</sup>。明后期，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率部南下青海，击败先前的蒙古诸部，成为青海最大的蒙古势力<sup>8</sup>。万历六年（1578），俺答汗与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后被追封为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畔仰华寺举行会晤，宣誓蒙古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坚定支持者，同时宣告取缔蒙古原有的萨满教，皈依藏传佛教格鲁派。由此，开启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向整个蒙古地区的大规模传播<sup>9</sup>。是时，格鲁派因在西藏内部受到排挤和压制，格鲁派上层集团遂采取援引蒙古势力入藏打击对手和确立主导地位的策略，这不但导致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Yonten Gyatso）转世于蒙古黄金家族并由蒙古军队护送到拉萨坐床<sup>10</sup>，也导致随后入据青海的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率军入藏，确立格鲁派在西藏的统治地位，固始汗成为执掌西藏地方世俗权力的汗王。自此，蒙藏之间形成了以宗教为连接纽带的特殊政治联盟。<sup>11</sup>

<sup>1</sup> 石硕：《蒙古在连结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中的作用》，《西藏研究》1993年第4期，第87-95页。

<sup>2</sup> 元朝在统治青藏高原地区后，设置了三个军政机构进行管理，即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和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参见石硕：《藏族三大传统地理区域形成过程探讨》，《中国藏学》2014年第3期，第51-59页。

<sup>3</sup> 祝启源、陈庆英：《元代西藏地方驿站考释》，《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第26-38页。

<sup>4</sup> 陈庆英、仁庆扎西：《元朝帝师制度述略》，《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第44-62页。

<sup>5</sup> 石硕：《西藏文明的东向发展——13世纪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形成的必然性》，《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第167-176页。

<sup>6</sup> 明朝正德年间，右翼蒙古鄂尔多斯部首领满都鲁阿哈刺忽为达延汗所败，其族裔长期盘踞河套地区，明人称为“套虏”，该部后由俺答汗之侄孙宾兔统领，所谓“套虏宾兔等酋分住河西大小松山”。参见《明世宗实录》卷四，正德十六年七月戊寅，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206-207页；《明神宗实录》卷三一，万历二年十一月戊寅，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737页。

<sup>7</sup> 曾现江：《胡系民族与藏彝走廊：以蒙古族为中心的历史学考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页。

<sup>8</sup> 史称“众号十万分，为四十二枝”。参见郑洛：《敬陈备御海虏事宜以弭后患疏》，《明经世文编》卷四〇五《郑经略奏疏》，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398页。

<sup>9</sup> 石硕：《格鲁派的兴起及其向蒙古地区传播的社会政治背景》，《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第16-22页。

<sup>10</sup> 云丹嘉措是历代达赖喇嘛中唯一的蒙古人。参见樊保良：《略论四世达赖喇嘛与蒙藏关系》，《中国藏学》1993年第4期，第82-88页。

<sup>11</sup> 石硕：《西藏文明的东向发展——13世纪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形成的必然性》。

上述情形发生于清朝入关前后。清入关以前满蒙之间已结成联盟，清朝入关很大程度是“翳蒙古外戚扈戴之力”<sup>1</sup>。鉴于蒙藏之间以宗教为纽带的紧密联系及蒙古控制青藏高原地区的局面，清入关前后即顺治和康、雍、乾时期，均采取了“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策略，以极高规格迎请五世达赖和六世班禅进京朝觐并予以册封和厚赏，崇奉藏传佛教并给予西藏僧人极高的政治礼遇，还斥巨资修建承德外八庙供蒙古王公朝拜，主要目的正在于“安众蒙古”。

在16世纪-18世纪的中国北方地域，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形，随着格鲁派向整个蒙古地区的大规模传播，宗教成为蒙藏之间的特殊连接纽带，蒙古以此为基础形成对西藏、青海及整个青藏高原地区的有效控制。另一方面，同样与蒙古结盟并“翳蒙古外戚扈戴之力”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鉴于满蒙联盟系清朝之基石且蒙古普遍信奉黄教，遂采取“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策略，尊崇黄教并给予极高政治地位与礼遇，以笼络和结纳蒙古人心。这样，在清朝及蒙、藏之间遂因宗教这一连接纽带而形成特殊政治关系，清朝正是通过成功地介入蒙、藏之间的宗教连接纽带，一方面加强、巩固与蒙古的联盟关系，同时通过“兴黄教”来加强同格鲁派上层的直接联系，逐步取代蒙古对青藏高原地区乃至新疆天山南北的控制权，最终将蒙古控制的青藏高原地区、内外蒙古地区和新疆地区牢固地纳入版图<sup>2</sup>。谭其骧在谈到这段历史时说：“17世纪、18世纪清朝之所以能够在这么大的范围之内完成统一，这决不是单纯的由于那时的清朝在军事上很强，在军事上取得一系列的胜利所能够做到的。单纯的、一时军事上的胜利和军事征服要是没有社会、经济基础来维持的话，统一是不能持久的。”<sup>3</sup>实乃洞见。清朝“之所以能够在这么大的范围之内完成统一”，将整个中国北方地域纳入版图，所凭藉的主要不是军事力量，而是充分利用了蒙藏之间的宗教连接纽带，因势利导地采取了“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策略。而藏传佛教格鲁派向蒙古社会的大规模传播，正是清朝“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社会文化基础。

17世纪以来蒙古社会普遍接受藏传佛教，从根本上说，由三个因素所决定：

其一，基于半月形文化带的相似的气候条件、生态环境、经济类型与社会形态，青藏高原同北方游牧文化之间存在很大融通性，尤其是青藏高原本土的苯教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萨满教之间存在大量共性，使包含大量苯教内容的藏传佛教同蒙古萨满信仰之间颇相契合<sup>4</sup>。所以，蒙藏之间在文化和宗教上的诸多共性与融通性，为二者形成特殊的宗教连接纽带提供了可能。但可能性并不等于必然性，倘若没有半月形文化带在北方游牧地区与青藏高原地区之间所起的连接作用，没有蒙藏之间通过半月形文化带的沟通联系与密切交流，就不可能导致藏传佛教格鲁派向蒙古社会的大规模传播，蒙藏之间也不可能形成特殊的宗教连接纽带。

其二，青藏高原地区经济的基本类型是北牧、南农。青海、藏北及今甘南和川西北地区，存在广袤、连片的牧区，为游牧民族从东北沿半月形文化带向西南拓展提供了广阔的游牧空间。无论是鲜卑慕容部南下青海建立吐谷浑、西秦、南凉等政权，还是明末清初蒙古各部源源不断地沿半月形文化带南下青海、西藏以及甘南、川西北地区，都体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扩张性及拓展生存空间的需求。所以，13世纪以来蒙藏之间发生密切关系以及在宗教和文化上的高度融合，绝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具有很大历史必然性。

其三，自新石器时代起半月形文化带就存在大量相似文化因素，是游牧民族频繁流动和彼此密切联系的地理文化带。13世纪以来蒙藏之间发生的紧密联系和大规模文化融通，不过是一种历史的延续，是半月形文化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连接作用的生动体现。

<sup>1</sup> 魏源：“科尔沁从龙佐命，世为肺腑，与国休戚。孝端文皇后、孝庄文皇后、孝惠章皇后皆科尔沁女，故世祖当草创初，冲龄践祚，中外帖然，翳蒙古外戚扈戴之力。”见魏源：《圣武记》卷三《国朝绥服蒙古记一》，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99页。

<sup>2</sup> 经过康雍乾三代长达七十年的斗争，清朝不仅把准噶尔本部收入版图，也把原来在准噶尔及和硕特部控治之下的青海、西藏和“回疆”即天山南路纳入版图。

<sup>3</sup> 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第36页。

<sup>4</sup> 阿旺加措：《苯教和藏传佛教之关系概说》，《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第66-70页。

从以上三点看，13世纪以来蒙藏之间发生大规模交流及由此导致的藏传佛教向整个蒙古地区的传播，以及二者在政治和文化的紧密结合，决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有着深刻的文化、地理和生态环境基础。蒙藏之间紧密结合所带来的青藏高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之间形成的整体性，很大程度正是依凭于半月形文化带在沟通联结上发挥的重要作用。

很显然，倘若没有蒙藏结合所框定的中国北方地域以宗教为连接纽带的整体性，清朝“能够在这么大的范围之内”完成对中国北方地域的统一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清朝正是成功利用了蒙藏之间所框定的中国北方地域的整体性，在统一北方地域上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此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入主中原建立清朝的满族统治者，同样起源于半月形文化地带，他们同样有着信奉萨满教之文化“底色”，这使清朝统治者对连接蒙藏之间的藏传佛教有着一种独特的理解和亲近感，所谓“明修长城，清修庙”、修建承德外八庙以及“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均足以说明其深谙蒙藏宗教联系之奥妙。事实上，清朝统治者的政治考量与自身宗教情结有着一种微妙联系和张力，今北京遗留的清朝皇家寺庙、佛教遗迹等大多属于藏传佛教性质，即是对此的最好诠释。<sup>1</sup>

民国初年，孙中山提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其中满、蒙、藏均分布于半月形文化带。这反映半月形文化带在中华民族的构成及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民国时期，管理民族事务的机构以突出蒙、藏为特点称“蒙藏委员会”，很大程度上正是承袭历史上蒙、藏在中华民族形成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结果。

综上，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半月形文化带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进程中起了关键性连接作用。正因为如此，半月形文化带对我们认识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地理与文化视角。

#### 四、半月形文化带对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价值

毫无疑问，作为从新石器时代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国历史时期并承载着丰富历史内涵的地理文化带，半月形文化带为我们从整体上认识中国历史的演变及特点提供了新的视野。从大的方面看，半月形文化带对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至少有以下三方面重要价值：

1.半月形文化带告诉我们，历史上农耕民族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并非简单以长城作为分割，二者之间存在一条农牧混合的漫长、宽阔、模糊的地理带。

众所周知，被称作“中国”或“华夏”的定居农耕民族同被称作“夷狄”的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绵延不绝的冲突、战争和交往与融合，是贯穿中国历史的一条主线<sup>2</sup>。古人云：“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若线。”<sup>3</sup>“北狄自古为中国患”<sup>4</sup>。中国历史上不少王朝（或政权），如五胡十六国（姑且将其算作一体）、北魏、北周、北齐、辽朝、金朝、西夏、元、清等均是北方民族即史籍所称的“夷狄”所建立。隋、唐盛世也有浓厚中间性质，属“中国”“夷狄”高度整合的类型，兼具两者的特点和性质<sup>5</sup>。故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指出：“通晓中国历史的关键之一

<sup>1</sup> 据李德成调查与统计，今日北京遗留下来皇家寺庙与佛教遗迹大多属于藏传佛教性质。参见李德成：《藏传佛教与北京》，北京：华文出版社1995年。故宫中有乾隆皇帝专门修习藏传佛教密宗的“梵华殿”。

<sup>2</sup> 石硕：《中华民族的凝聚与演进——从“民族”角度认识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年第1期，第87-101页。

<sup>3</sup> 黄铭、曾亦译注：《春秋公羊传》，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51页。

<sup>4</sup>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唐太宗贞观四年四月戊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075页。

<sup>5</sup> 费孝通指出，唐朝“名义上是汉族统治，实际上是各族参与的政权”。见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见氏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6页。唐太宗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也说明唐朝之胡汉杂糅性质。参见《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第6247页。

是了解中国和它周围‘夷狄’地区之间势力消长的状况。”<sup>1</sup>这段话中，前一个“中国”是指今日之中国，后一个“中国”则指历史上与“夷狄”对应的“中国”称谓。

正是针对这一状况所言。顾颉刚说：“整部的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就是内外各族融合问题。”<sup>2</sup>这里的“内外”，系指长城的内与外。因此，从很大程度说，华夏农耕民族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由冲突、竞争而导致相互整合和民族融合，正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动力机制和主要原因。

但自秦以来，横亘于农耕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万里长城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认知。长城是华夏农耕民族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而建，古人遂以长城为界产生“塞内”“塞外”的称呼。这容易给我们造成一种错觉——把长城当作农耕地区与游牧地区之间的分界，进而也把农耕区域与游牧区域之间作一种线性的分割。事实上，这是不确切的。严格说，长城只是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进行攻防拉锯的军事分界线，长城的位置亦随双方势力消长不断变动，如秦长城与明朝防御蒙古的长城已不在一条线上<sup>3</sup>。尽管长城的走向大体同农、牧分界相关，但准确地说，长城只是一条线性的军事防御工事，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农、牧分界。以长城为农、牧分界的思维模式，实际上是把古代军事防御屏障同农、牧分界混为一谈的结果，也是对长城的误解。<sup>4</sup>

事实上，不同民族、文化的区域界线从来不是截然两分，更非呈线性分割。分界往往同时也是连接部分，是两者密切接触、交流和相互混同的部分<sup>5</sup>。农、牧间的地理文化边界更是如此。半月形文化带的价值在于，它清楚地告诉我们，农耕民族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并非简单以长城作为分割，二者之间存在一条游牧或农牧混合的相对宽阔、模糊的地理带。历史上活跃于该地带的民族包括了羌、氐、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满、藏以及由于各种原因流徙于边地的大量汉人<sup>6</sup>。如童恩正所言，他们正是“畜牧或半农半牧的民族”。他们在这一漫长而宽阔的边地中繁衍生息，彼此混同、密切交流和融合，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农、牧交接地带的独特景观。上世纪30年代，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对被农耕人群视作“边地”的蒙古、新疆地区的考察写成《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很大程度正是有感于学界对这一边地的忽视<sup>7</sup>。半月形文化带的价值在于，它清晰地告诉我们，该地理带的形成时间甚早，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延续至整个中国历史时期，是观察、认识历史上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接触、交往、交流的重要历史区域。<sup>8</sup>

## 2.半月形文化带揭示了北方游牧民族对农耕区域的包裹性

<sup>1</sup> 拉铁摩尔夫妇：《中国简明史》，陈芳芝、林幼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0页。这段话中，前一个“中国”是指今日之中国，后一个“中国”则指历史上与“夷狄”对应的“中国”称谓。

<sup>2</sup> 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0期，1939年5月8日，第4版。

<sup>3</sup> 王国良：《中国长城沿革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4-7、29-33、59-81页。

<sup>4</sup> 笔者考察陕西榆林地区（明代九边之一）农牧交错状况时发现：1. 毛乌素沙漠分布于长城以内；2. 当地农人栽种玉米却不吃玉米，而是喂羊，以羊的销售、食用作为生计来源。这表明农、牧结合带是一种相互渗透的复合性结构，地域亦较宽，并非一条线可以截然划分。

<sup>5</sup> 这一点在藏彝走廊地区可以得到很好说明。在多民族聚居的藏彝走廊地区，各民族及文化之间往往存在着中间性的模糊地带，该地带也是过渡和连接地带，在大的民族之间尤其如此。参见石硕：《藏彝走廊历史上的民族流动》，《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第88-89页。

<sup>6</sup> 历代因各种原因流落北部边地的汉人数量相当可观。如在汉朝与匈奴战争期间，匈奴大量劫掠汉人为奴，这是构成半月形地带民族混杂的重要因素。林幹认为匈奴所劫掠奴隶约占匈奴人口的七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约在50万人左右；马长寿认为匈奴的奴隶数量占匈奴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参见林幹：《匈奴社会制度初探》，见林幹编：《匈奴史论文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78-321页；马长寿：《论匈奴部落国家的奴隶制》，《历史研究》1954年第5期，第108-109页；《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第2958页。

<sup>7</sup> 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页。

<sup>8</sup> 半月形文化带所处位置，今天仍与北方农牧交错带重合。参见陈全功、张剑、杨丽娜：《基于GIS的中国农牧交错带的计算和模拟》，《兰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10期，第24-28页。

半月形文化带给我们的另一重要视角，是北方游牧民族对华夏农耕区域的包裹性。这是构成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

半月形文化带的产生和延续，既与生态环境相关，也与农、牧两大区域间的张力即华夏农耕民族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抵御密切相关。诚如翦伯赞所指出，从大兴安岭地区南下的北方游牧民族，竭力寻找突破长城的缺口，若不能突破，则沿半月形文化带不断向西迁徙。蒙古“先取西南诸番，藉以图金”，<sup>1</sup>忽必烈率大军由六盘山沿横断山南下“迂回大理，斡腹攻宋”<sup>2</sup>，灭大理以对南宋形成包抄之势，都充分说明这一点。清军最初进入四川，不走传统蜀道，而由陕南进入川北的阆中，也体现了北方民族对半月形文化带的依赖和充分利用。因此，半月形文化带的一个鲜明特征，是呈现出北方游牧民族对华夏农耕区域的包裹性。这种包裹性足以说明，在农、牧之间的相互需要和依存中，北方游牧民族是更为积极、主动的一方。事实上，历史上存在两种情形，一种是北方游牧民族无法突破长城南下中原时，他们会选择沿半月形文化带向西流动迁徙，进入西南或西北地区；另一种情形是，当其成功入主中原后，他们仍会选择沿半月形文化带向西南拓展生存空间。其中，最典型的是蒙古。蒙古在入主中原以前首先向西拓展，不仅灭了处于半月形文化带地带的西夏，并开始对西藏的征服。在从中原地区南下受阻情况下，蒙古军队还选择穿越横断山区进入云南，征服大理，进一步对南宋形成包抄之势。大范围迂回是蒙古作战的常用战术，但也体现北方游牧民族的扩张性与渗透能力。这种强大的扩张性和渗透能力，不但造成其对农耕区域的包裹性，也使农、牧之间发生联系的地域范围得到大幅度拓展，交流也更为密切。清朝雍正时期，史籍记“四川之松潘、打箭炉、里塘、巴塘与云南中甸等处，沿边数千里”，当地人“止知有蒙古，而不知有厅卫，不知有镇营”。<sup>3</sup>

事实上，从中国东北绵延于西南的半月形文化带，其宏观形态本身即呈现出对农耕区域的巨大包裹性。诚如童恩正指出，半月形文化带“如同一双有力的臂膀”，紧紧环抱着“祖国的腹心地区——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肥沃的平原和盆地”<sup>4</sup>。毫无疑问，半月形文化带所体现的北方游牧民族对农耕区域的包裹性，是我们理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地理与文化视角。

### 3.半月形文化带为认识中国文明起源提供了新思路

中国文明起源历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近年，随着新的考古发现不断涌现，该问题越发起学术界的兴趣与讨论。但在中国文明起源中，有一个现象颇值得注意——构成国家起源的若干因素，最早可能并非出现于农耕区域，而是有可能出现于北方，尤其出现于农牧结合的半月形文化地带。对此，我国现代考古学重要奠基人之一李济曾指出：

我们更老的老家——民族的兼文化的——除了中国本土以外，并在满洲、内蒙古、外蒙古以及西北利亚一带；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地方；到了秦始皇筑长城，才把这些地方永远断送给“他族”了。因此，现代人读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一类的古史，反觉得新鲜，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了。<sup>5</sup>

<sup>1</sup> 《元史》卷一四九《郭宝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521页。

<sup>2</sup> 曾现江：《胡系民族与藏彝走廊：以蒙古族为中心的历史学考察》，第51-71页。

<sup>3</sup> 年羹尧：《条陈西海善后事宜折》，见李永海等翻译点校：《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85页。

<sup>4</sup>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见文物出版社编辑部编：《文物与考古论集》，第17页。

<sup>5</sup> 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篇）〉后记》，1953年2月，转引自《李济文集》卷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3-134页。

周人则起源于西北地区，金景芳认为建立商朝的商人源自东北地区<sup>1</sup>，他们均是由北方地域南下进入中原的民族。李济这段话提示我们，在中国文明及国家起源上，北方可能是更值得关注的区域。

德国学者奥本海在《论国家》中明确提出，在纯粹农民居住区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不易产生国家，“国家首先在那些与遥远的草原接壤的富裕的农民地区产生”<sup>2</sup>。在冷兵器时代，通常规律是“农可富国，牧可强兵”。这既道出农、牧各自的优势，也反映各自的短板。其含义是：农可提供充裕粮食与财富，但缺乏强力；牧能带来强力，但却难以提供稳定、充裕的财富。文明以及国家的起源离不开两个条件，一个是财富，一个是强力。唯有二者高度结合，方能提供兼并周边部落、促成公共权力向王权转化的实力和动力。要兼具强力与财富，有效途径当然是农、牧紧密结合。由于农牧结合能带来“强兵”“富国”之优势，为单纯的农与单纯的牧所无法比拟，所以，农、牧结合地带是文明起源和国家产生最具可能性的地区。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文明及国家起源的诸多因素是先农牧结合地带酝酿、孕育，渐臻成熟之后，再于农耕地区粉墨登场？诚如翦伯赞所言，游牧人群首先在草原上经过部落争战、兼并而得到历练，当走出马门，粉墨登场时，“他们已经不仅是一群牧人，而是有组织的全副武装了的骑手、战士”<sup>3</sup>。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的产生是否也循着这样的轨迹与模式？这种可能性显然不能排除。

近年，随着考古学取得的一系列新进展，一些分布于半月形文化地带的考古遗址及发现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关注。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在从东北至内蒙中部再到甘青地区一线亦即半月形文化带，发现众多距今5 000—8 000年的考古遗址。甘青地区有大地湾遗址、石岭下遗址、马家窑文化遗址，其年代均在距今5 000—7 800年之间<sup>4</sup>。在内蒙古中部地区，则发现了红台坡下遗址、王墓山遗址、海生不浪遗址等，其中红台坡下遗址的年代距今达6 500年<sup>5</sup>。在内蒙古东部及辽西地区，发现了兴隆洼文化遗址、赵宝沟文化遗址、富河文化遗址、红山文化遗址、小河沿文化遗址等，其中，兴隆洼文化遗址的年代距今达8 000年<sup>6</sup>。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遗址中均存在农业或农牧混合因素<sup>7</sup>，符合童恩正关于半月形文化带“一直是畜牧或半农半牧的民族繁衍生息的场所”的判断。

第二，在半月形地带的考古文化中，出现若干象征和标志王权的遗物。例如，作为数千年中国王权象征与标志的“龙”，最早出现于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中<sup>8</sup>。尤值得惊叹的是，呈现早期国家形态和特征的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也正好分布于农牧交接的半月形文化地带。据笔者对石峁遗址的实地考察，有两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其一，这是一座功能完备、布局复杂、等级结构森严的大型城址；其二，从遗址中发现不少体现王权威严的大型人面石雕来判断，其王权发育程度已达到相当的水平，应是迈入文明门槛并具有国家雏形的重要遗址。<sup>9</sup>

<sup>1</sup> 金景芳：《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说》，见朱东润主编：《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复刊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65-70页。

<sup>2</sup> 奥本海：《论国家》，沈蕴芳、王燕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5页。

<sup>3</sup> 翦伯赞：《内蒙访古》，《人民日报》1961年12月13日，第5版。

<sup>4</sup> 赵建龙：《甘肃秦安县大地湾遗址仰韶文化早期聚落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第6期，第19页；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考古》1977年第4期，第223页。

<sup>5</sup> 田广金：《内蒙古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考古发现和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1992年合刊，第6页；田广金：《论内蒙古中南部史前考》，《考古学报》1991年第2期，第123、140页。

<sup>6</sup> 杨虎、朱延平：《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10期，第871页；杨虎、刘国祥：《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1992年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1期，第25页。

<sup>7</sup> 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形成与气候变迁》，《考古》2005年第10期，第57-67页。

<sup>8</sup> 孙守道：《三星他拉红山文化玉龙考》，《文物》1984年第6期，第7-10页。

<sup>9</sup>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等：《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考古》2013年第7期，第15-24页。尚在发掘整理之中，材料未完全公布。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sup>1</sup>，表明龙门（今陕西韩城市）到碣石（今河北昌黎县）一带是西汉以前农、牧之间的一个大致分界。<sup>2</sup>这说明在先秦时期，农牧交接与混合地带比今天要广阔。从周祖“不密以失其官而彝戎狄之间”<sup>3</sup>，秦之先祖“或在中国，或在夷狄”<sup>4</sup>，《春秋》“诸夏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进乎诸夏则诸夏之”<sup>5</sup>等记载看，也可证明先秦时代农、牧结合程度远比今天要高<sup>6</sup>。处于文明门槛、已呈现国家雏形的大型石峁城址，为何出现在半月形文化带上？这意味着什么？蕴藏什么样的历史密码？考古学界有学者认为晋西南的陶寺遗址与石峁遗址存在明显渊源关系但时代稍晚<sup>7</sup>，这是否意味着最初的文明是产生于农牧结合地带，之后才向黄河中下游的农耕地区迁移？这极可能预示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的一个方向性问题——农牧结合地带极有可能是孕育早期文明及国家起源的一个关键性区域？这或许正是半月形文化带给我们理解和认识中国文明起源带来的新视野、新思路。

毫无疑问，由考古材料所揭示的从东北沿长城一线到西北再折向西南的半月形文化带，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长时段、大范围、大跨度的农牧结合带，该地理文化带为我们观察、认识北方民族活动规律及其同农耕民族关系提供了全新视野。<sup>8</sup>

有关半月形文化带对认识中国历史的意义与价值，唐晓峰曾作如下阐释：

我国北方有一个绵长的农牧接触地带，这样一个特殊的人文地理结构为中国历史带来了一项恒久的历史主题。在中国古代的“正史”中对这个历史主题有丰富的反映。近世美国学者拉铁摩尔曾详细考察过这个历史主题，写有《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今天的史学家、考古学家都承认，遗漏掉这个历史主题将不成其为中国历史。在国家起源的问题上，很可能也是如此。<sup>9</sup>

这一阐释客观且极富洞见。从相当意义上说，呈半月形的这条“绵长的农牧接触地带”，正是中国历史中一个“恒久的历史主题”。正因为如此，英国学者杰西卡·罗森将其称作“中国弧”（China's arc）<sup>10</sup>。许倬云不但充分肯定半月形文化带的价值，还进一步认为：“童恩正先生划出的这条传播带，还应该向南北两头延伸，向北应越过长城以北草原地带，向南应该延伸到中南半岛，这应该是一条国际文化交流传播带。”<sup>11</sup>

半月形文化带是大兴安岭与青藏高原之间的一个绵长的地理连接带。大兴安岭地区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摇篮，中国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鲜卑、契丹、蒙古、女真、满等均起源于大兴安岭及周边地区。这些民族在入主中原的同时，均不同程度沿半月形文化带流动迁徙，从而使北方民族在该地带表现很大的承续性和相互联系。因此，半月形文化带有助于让我们摆脱以往多从分散和单一民族角度研究北方民族及中原关系的范式，给认识北方游牧民族的活动带来了一种整体视野。过去，我们对北方游牧民族同华夏农耕民族之间的冲突、整合与交融，往往比较侧重于

<sup>1</sup>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3254页。

<sup>2</sup> 史念海将之概括为“龙门—碣石线”，作为中国最早的农牧分界线。参见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3页。

<sup>3</sup> 《史记》卷四《周本纪》，第112页。

<sup>4</sup> 《史记》卷五《秦本纪》，第174页。

<sup>5</sup> 韩愈《原道》：“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参见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0页。樊文礼认为韩愈原文是“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近人整理韩愈作品时，不恰当地删除了“夷而”两字。参见樊文礼：《儒家民族思想研究（先秦至隋唐）》，济南：齐鲁书社2011年，第217-223页。

<sup>6</sup> 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19年。

<sup>7</sup> 邵晶：《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的比较研究》，《考古》2020年第5期，第65-77页。

<sup>8</sup>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见文物出版社编辑部编：《文物与考古论集》，第34页。

<sup>9</sup> 唐晓峰：《人文地理随笔》，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07页。

<sup>10</sup> 刘歆益：《沟通东西方的“中国弧”》，《人民日报》2017年6月13日，第24版。

<sup>11</sup> 段渝：《藏彝走廊与丝绸之路》，《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第1页。

单一民族视角，即多从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藏、满等不同民族角度进行考察，对北方民族与华夏农耕民族之间的接触交融及文化上的承续性和整体性缺乏必要的关注。半月形文化带所呈现的北方游牧民族对农耕区域的包裹性及彼此交融、整合的延续性，有助于我们更为宏观但又具体、深入地认识把握北方游牧民族活动规律和整体特点。缺失了半月形文化带的视野，我们对中国历史及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整体性认识就会受到很大的局限。唐晓峰正是在此意义上说：“遗漏掉这个历史主题将不成其为中国历史。”<sup>1</sup>

20世纪80年代初，费孝通在反思我国民族研究的局限时，曾指出两大弊端，一是按行政区划、二是从单一民族单位来研究民族。针对这两大弊端，费孝通给出两个基本方案：第一，从中华民族所在地域的整体视野来开展民族研究；第二，按照“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来开展民族研究<sup>2</sup>。很显然，半月形文化带正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兼有农、牧交融之特点，具有中华民族所在地域之整体视野。因此，从半月形文化带视野来审视、考察北方游牧民族之间彼此的关联性及其同华夏农耕民族之间的整合与交融，无疑是在中华民族的认识格局上取得突破的一个重要学术方向。

不应忽视的是，半月形文化带所呈现的对农耕区域的包裹性以及在中国民族形成过程中发挥的重要连接作用。在中国疆域内，有两大高地至关重要。一是位于西南的青藏高原，滋养并浇灌农耕区域的黄河、长江均发源于青藏高原，可以说，是青藏高原的水滋养了华夏农耕文明。另一个是东北的大兴安岭，大兴安岭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发源地，大兴安岭的水不但滋养着东北森林和大平原，也滋养了整个北方草原。半月形文化带正是连接和沟通大兴安岭与青藏高原之间的地理连接带，同时也是农耕和游牧两大民族系统发生交错与紧密链接的“文化带”。这一特殊地位，可能正是半月形文化带在中国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发挥重要连接作用的原因。

就中国历史而言，农牧之间的整合与交融是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核心内涵。半月形文化带作为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规律性迁徙流动的地理文化带，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农牧互动、交流与融合的新视野、新思路，这正是半月形文化带的重要意义与价值所在。

#### 四、结语

前人的很多发现和提出的新概念，并非立即能被同时代的人理解和接受，其思想内涵和价值往往需要时间的沉淀后才逐步凸显，这是学术史上的普遍现象。今天，随着学术进步及相关研究领域不断深入和拓宽，学界越来越意识到半月形文化带的重要价值。近年来，学界对半月形文化带的讨论及对此概念的使用日渐增多。两种情况较突出：其一，在有关古代中国文明以及农牧关系的研究中广泛涉及和使用此概念<sup>3</sup>，或有学者受此理论启发，提出中国沿海地区也存在一个半月形文化地带<sup>4</sup>；其二，在半月形文化地带特别西南地区一些个案研究中，往往用半月形文化带的理论对个案进行阐释<sup>5</sup>。这些现象说明，半月形文化带的价值正在被学界重新发现和认识。此外，就我个人体会而言，早年拜读童师论述半月形文化带的宏文，觉得思路、视野宏阔，方法严密，但对其学术价值和意义却体会不深。直到做中国民族史和藏学研究有年，有所积累并逐渐触

<sup>1</sup> 唐晓峰：《人文地理随笔》，第107页。

<sup>2</sup> 石硕：《从中华民族整体格局与视野开展我国的民族研究——改革开放初期费孝通反思民族研究的启示》，《民族研究》2021年第3期，第15-22页。

<sup>3</sup> 陈民镇：《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勾勒出“最初的中国”》，《中华读书报》2017年2月8日，第10版。

<sup>4</sup> 李零：《茫茫禹迹·中国的两次大一统》，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第23-24页。

<sup>5</sup> 赵德云：《文化传播、萨满教“底层”与早期中国文化格局——童恩正“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再思》，《四川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第28-39页；李飞：《“童恩正带”：羁縻·土司制度与山地中国》，《贵州民族研究》2022年第2期，第172-177页。

类旁通，才深切体会到半月形文化带是极富思想内涵的学术概念，为认识中国历史和民族活动带来了全新视野，堪称原创性的突破。

学术史和思想史，归根到底是概念史。一个蕴含新思想、新视野的学术概念，犹如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让我们在过去视而不见或一大堆杂乱无章的事实中找到一条能将之串连起来的“思想之绳”。半月形文化带正是让我们能深刻洞悉中国历史，把民族史领域中诸多纷繁杂乱的事实串连起来的“思想之绳”。

此外，不能忽略的是，童恩正提出半月形文化带在方法上给我们的启迪。这就是不囿于学科藩篱，把考古材料的阐释同历史、民族、地理、人类学紧密结合，并辅以生态学视角。这种熔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生态学于一炉的视野和方法，正是其在学术上取得突破的关键所在。这一切并非偶然，童恩正中学时“偏爱理科”<sup>1</sup>，一生热爱科幻，在科幻文学方面有极高天分和成就，被誉为“才华横溢的考古学家兼科幻作家”<sup>2</sup>。在走上考古专业道路后，仍以极大热情和精力投入科幻文学创作。童恩正能提出半月形文化带，与他在科幻文学领域丰富的想象力不无关系。学术创新与想象力犹如孪生兄弟，二者有密切内在关联。诚如李水城指出：“今天回过头看，童先生‘两栖’爱好的个性不仅激发了他的学术创作灵感，也大大丰富了他的研究领域。”<sup>3</sup>古人云“工夫在诗外”。以问题为纲，文理交叉的思维和突破学科界线的视野，或许正是学术开拓的精髓所在。

最后谈谈“半月形文化带”的称谓问题。目前学界对半月形文化带的称谓较为多样，表述各异。常见的有“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半月形地带”“边地半月形带”“半月形文化带”“童恩正带”“童恩正线”等等。国外有学者将其称作“中国弧”(China's arc)<sup>4</sup>。称谓多样化有其积极意义，反映学界对该概念浓厚的兴趣和关注。本文所以用“半月形文化带”，只因该称谓相对简明，易于传播，含义也较明确。一个学术概念能否广泛传播并为大众接受，与称谓关系极大。故秉持“简明”原则。至于“童恩正线”的称谓，主要问题是“线”和“带”有明显差异，把“带”称作“线”并不合适。而称“童恩正带”，有仿“胡焕庸线”之嫌，有生硬、牵强的意味。笔者以为在没有更准确、恰当的称呼前，直接称“半月形文化带”，或许更简明、直观，更易传播和理解。

学界常将“半月形文化带”与“胡焕庸线”相提并论，合称“双璧”，原因是二者均着眼于从东北到西南的视角。其实，仔细揣摩，两者存在一个根本差异——“胡焕庸线”表现的是东、西之间的巨大反差；“半月形文化带”呈现的却是从中国东北到西南的一条文化地理带，它既是农牧结合带，也是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迁徙流动最为频繁、最为活跃的地理带。更重要的是，诚如童恩正指出，此半月形文化带“如同一双有力的臂膀”，紧紧环抱着“祖国的腹心地区——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肥沃的平原和盆地”并与之密切互动，在中国历史发展及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此意义上说，半月形文化带承载着历史、考古、民族、地理、语言、生态和人类学的丰富内涵，堪称理解中国民族和历史脉络的一把钥匙。

## 【论 文】

<sup>1</sup> 李水城：《文史双馨、学贯中西：记考古学家童恩正》，《中国文化》2021年第1期，第391页。

<sup>2</sup> 陈民镇：《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勾勒出“最初的中国”》，《中华读书报》2017年2月8日，第10版。

<sup>3</sup> 李水城：《文史双馨、学贯中西：记考古学家童恩正》，《中国文化》2021年第1期，第397页。

<sup>4</sup> 刘歆益：《沟通东西方的“中国弧”》，《人民日报》2017年6月13日，第24版。

#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成立始末及其对民族研究的贡献<sup>1</sup>

索文清、郭丹丹<sup>2</sup>

**摘要：**汇集了著名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一众学科大家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最具实力及影响力的民族问题研究机构。1952-1958年六年时间中，研究部不但以文件形式将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四元学科结构予以确定，还协助组建了民族学研究的最高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为民族学研究、发展以及全国范围内的民族调查奠定了学科、制度基础。此外，研究部的科研人员还通过参加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等一系列社会实践活动，撰写了大量民族学、民族史方面的著作，培养了大批民族工作人才，为推动我国民族事业进步和民族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研究部；民族研究；贡献；中央民族学院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就把开展民族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10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4年9月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下同）下属的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民委”，1954年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正式成立。翌年9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主持起草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11月，第60次政务会议正式批准了这两个方案。两个方案的提出，说明此时国家培养和培训各级民族干部和民族研究人才的紧迫性。《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为即将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明确了以下任务：“第一，为国内各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以及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培养高级和中级的干部；第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发扬并介绍各民族的优良历史文化；第三，组织和领导关于少数民族方面的编辑和翻译工作。”<sup>[1]</sup>

根据任务精神，中央民委加快了筹办中央民族学院的步伐，从全国各地抽调一批当年在延安民族学院工作过的同志来参与建校工作。在他们的努力之下，1951年6月11日，中央民族学院开学典礼暨成立仪式在国子监隆重召开<sup>①</sup>。1952年秋季，全国高等院校开始院系调整，社会学、人类学专业被取消。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从事社会人类学、民族学、民族史、古文献、古代民族文字研究的学者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部分研究员一起调入中央民族学院工作。这些学者包括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杨成志、吴泽霖、林耀华等和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翁独健、冯家昇、傅乐焕、王静如、王钟翰、陈述等人。这批学者都曾留学国外，各有学术专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教育帮助下经过不断学习和思想改造，树立和加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已成为国家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们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不仅提高了学院的学术地位，缓解了师资缺乏问题，同时也为下一阶段学院全方位开展民族研究和正规高等教育奠定了人才基础。

## 一、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成立始末

1952年9月，在中央民委的亲切关怀下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以下简称“研究部”）正式成立<sup>[2]</sup>。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京畿地区最早建起的一个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重要基地。从各高校和研究所集中到这里的专家学者众多，其中教授、副教授就有19人，老讲师22人，

<sup>1</sup> 本文刊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24年第4期。

<sup>2</sup> 作者：索文清，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郭丹丹，中央民族大学档案馆助理研究员。

还有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年轻助教和专门进行翻译、出版、图书和文物管理的辅助人员，总人数达近百人<sup>[3]</sup>。为了充分发挥专家学者们的专长特点，抓好研究部领导班子的建设和各类机构的设置成为头等大事。学院邀请了蒙古史专家、时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的翁独健做研究部主任，副主任则由学院的教务长宗群担当。研究部最初按民族和区域先后设立了藏族、东北内蒙、西北、西南、中南五个研究室<sup>[4]</sup>，后为集中人力便于指导，将五个研究室合并为三个，仍按相近民族划分：第一研究室由翁独健兼任主任，副主任是辽、金史专家傅乐焕，秘书程溯洛，全室人员有 19 人<sup>①[5]</sup>，研究方向确定以东北、西北主要是通古斯和阿尔泰语系的各民族历史和现况为主；第二研究室主任是林耀华，副主任是西夏语言文史专家王静如，秘书宋蜀华，全室共有 16 人<sup>②[5]</sup>，研究方向确定以藏族、彝族及与他们有密切联系的诸民族历史和现况为主；第三研究室则由潘光旦任主任，副主任费孝通（兼），秘书汪明瑛，全室人员共 15 人<sup>③[5]</sup>，研究方向以西南、中南各民族，主要是壮侗、苗瑶语族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为主。

除了以上三个研究室，研究部同时配备了以翦伯赞为主任，陈述（兼）、孙钺、吴恒组成的少数民族史料丛刊编辑组；以王钟翰为主任，吴丰培为秘书，胡先晋等 8 人组成的图书资料编译室；以杨成志为主任，伍仲芳等 12 人组成的民族文物室和以吴文藻为主任，陈永龄为副主任，沈瑶华为秘书，包括朱宁的民族情况教研室。不难发现，所有的研究室（组）均系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专家学者引领，并由教授、讲师、助教三结合的严整梯队组成。这样的安排使每个研究室的工作人员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他们的学术专长和积极性，从而保证了各项研究成果的质量。

工作伊始，学院领导依据上级指示为研究部规定了如下方针任务：“首先是配合好当前民族工作的需要，对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概况作系统整理，并从几个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入手，对其历史文化、社会经济作较深入的研究”<sup>[6]</sup>。其次研究部是学院的下属单位，要兼及教学，有责任帮助培养提高本院教师研究民族问题的水平并担负各系科开设的有关民族历史文化的上课任务，除了这些，研究部还要承担全国各地外单位来函有关民族历史和民族现况问题的解答及协助审核外边的来稿。这些方针任务的规定是从符合本院和外单位的需要出发，研究部的每位研究人员从领导的指示中领会到了自身的责任，都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自觉投身到工作中去。

## 二、开展中国民族历史和民族现况调查研究

根据上级单位的急需，研究部各室领导组织部分人员率先完成了《中国民族情况简表及分布图》<sup>④</sup>和《二十一种有关民族问题情况介绍》两项任务。

其间，三个研究室中从事民族史和民族学研究的研究者们，认真学习了党的民族理论及民族政策，从中摸索认识到研究部的一切研究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政治挂帅，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以民族现况的研究为主。作为民族学的研究者，必须下到民族地区去进行认真的田野调查和亲身体验观察；作为民族历史的研究者要下功夫先从搜集、整理、编纂各少数民族史料入手，再有步骤有计划地编写从简到繁的各民族历史。无论是搞民族学研究，还是民族史研究必须采取紧密配合、分工合作的办法<sup>[7]</sup>。大家明确了每个人的方向之后，便团结一致、兢兢业业地开始工作。从中央民族大学档案馆收藏的档案中可以清楚发现，研究部成立不到两年时间无论是民族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编纂，还是民族现况的深入调查，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先说民族历史研究部分。

由第一研究室傅乐焕先生带领王钟翰、宪度之、楚明善、贾敬颜等四位先生率先完成了 32 万字的《满族史料简编》，冯家异、程洛、穆广文等三位先生完成了 20 万字的《维吾尔史料简编》，孙钺、吴恒、蒋家骅等三位先生完成了 6.5 万字的《彝族史料简编》。随后，又有马鹤天、汪公量先生完成了 5.6 万字的《青海土族历史研究初稿》，陈述先生完成了 5 万字的《达斡尔史论证（草稿）》和金在冶先生撰写的约 10 万字的《哈萨克现代史》。此外，第三研究室潘光旦、汪

明瑀两位先生共同完成约9万字的《土家族的历史由来与补正》及潘光旦先生个人完成的《开封的中国犹太人前编》<sup>[8]</sup>。有关蒙古世系的史料部分，楚明善先生把漠南蒙古、厄鲁特、和硕特和准噶尔部蒙古分布及世系情况都括在他的著述和所附的20张地图中。

以上所述的这些历史研究成果，是众多学养深厚的老专家与年轻的讲师、助教一起共同努力合作、相互配合取得的。

再谈民族现况研究部分。

集中在第二、第三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多是长期从事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教学和研究人员，他们均有田野调查的实践经验。领导下达任务后，他们便主动深入到各民族地区展开了调查。深入内蒙古自治区的调查小组，以傅乐焕为主，首先写出了7万多字的调查报告《达斡尔族概况》和《鄂伦春族社会组织》；进入甘青地区的调查小组，以陈永龄、马鹤天为主，写出了6万字的《甘肃东乡族社会调查总结初稿》、11万字的《青海土族社会调查总结初稿》和3万字的《青海循化撒拉族社会调查资料总结》；进入湖南地区的调查小组，以汪明瑀、胡克瑾为主，写出了《湘西土家概况》；前往广东的调查小组，以杨成志、耿杰为主，写出了《海南岛黎族现状》和《关于沿海蛋民情况》<sup>[9]</sup>。以上这批完成的调查报告是民族学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进入民族地区通过实地调查写出的，它反映了各民族地区最真实的现状，为国家有关部门了解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面貌和文化习俗，制定相应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还要特别提及的是林耀华先生领导的第二研究室，当时曾集中了国内众多藏学研究的学者他们是王静如、李有义、王森、吴丰培、柳陞祺、宋蜀华和年轻助教王恩庆、蔡绍庐、王辅仁、王晓义等。这些学者在未调入研究部前，已有研究成果问世。如林耀华先生早在1940年代就深入到西康省北部和四川省嘉绒藏区对藏人的家庭婚姻、亲属制度、宗教生活和土司制度进行过考察，写出了《康北藏民的社会状况》《川康嘉绒的家族与婚姻》和《四土嘉绒》等著作<sup>[9]79</sup>。在西藏工作和生活多年的李有义先生为使国人了解西藏的历史与现状，于1951年初出版了他撰写的《今日的西藏》<sup>①</sup>，而王森、吴丰培两位先生对西藏宗教和西藏的文献档案均有多年深入研究，他们的著述在藏学界早有传播。当这些学者集聚到研究部后，正遇上《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不久，中央人民政府急需对西藏社会和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有所了解，作为制定政策参考。于是这些研究藏学的学者们适时地深入西藏腹地和其他藏区进行考察，完成了一批反映藏区现实情况的调查报告和著作，其中有林耀华、李有义、宋蜀华、王恩庆、王辅仁等五人撰写的约10万字的《西藏社会概况》<sup>①</sup>，宋蜀华撰写的约3万字的《昌都地区社会概况》，王辅仁整理编写的《波密简述》<sup>②</sup>，王恩庆撰写的3万字的《西康三十九族地区社会概况》以及李有义撰写的约11万字的《西康藏族自治州社会概况》和柳陞祺先生修订的《拉萨三大寺僧人学制》<sup>[8]</sup>，等等。

这批内容新鲜翔实、反映西藏现实情况的学术成果，受到政府部门及学术界的特别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进藏干部和部队战士从这些著作中了解了尚未进行改革的旧西藏状况，对进藏后执行当地民族宗教政策有很大的帮助。学术界的同仁认为，这些学术成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早介绍西藏经济社会历史和宗教文化习俗的民族学著作，对民族学学科的振兴发展起到推进作用。

与此同时，少数民族史料丛刊编辑室和民族文物室两个部门也做了大量工作。翦伯赞是熟悉中国民族史料的大家，他调入研究部主要抓少数民族史料编纂整理工作。与他共事的陈述、孙钺、吴恒等三位先生都具备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整理编纂史料经验。他们工作效率很高，不到两年就标点校注、摘录了《二十四史》中的少数民族史料达200万字，定名为《历代各族传记汇编》<sup>[10]</sup>。著作编成后很受学术界重视，不久便被各家出版社陆续出版。

民族文物室在研究部的部门中是一个较特殊的单位。初期为他们规定的任务是为各项研究工作服务，做好文物保管和图片的征集整理，兼顾做一点展览工作。两年间，通过全室人员的不懈

努力，在房屋有限的情况下，他们竟举办各种大、小型展览 10 余次，接待观众包括国际友人 1 万多人，并从全国各地征集到 40 多个民族的各类文物达 20334 件，照片 11311 张<sup>[11]</sup>。这些成绩也大大丰富了文物室的收藏，使规模不大的文物室在国内小有名气。从广东中山大学调来主管文物室的杨成志先生，是我国老一代人类学民俗学、博物馆学专家，一生都十分关注文物保护和收藏，多次积极倡导建立民族博物馆。他到研究部不久，就和潘光旦、吴文藻两位先生一同起草了《中央民族博物馆十二年远景规划大纲》，并得到费孝通、林耀华、吴泽霖、杨堃宋蜀华等先生的一致响应。遗憾的是他们的这一要求在当时没有条件实现。直到 1980 年代，国家意识到博物馆在民族研究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主动在各地民族学院建起了民族博物馆。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博物馆也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于 1987 年宣布成立。

以上所述仅是两年来研究部所做出的部分成绩。比如王静如先生在语言学方面写就的有关达斡尔族和湘西土家族两个民族的语言概况费孝通先生整理改编的《佤族社会概况》和《畚民社会概况》以及杨成志先生写成的《两广疍民社会生活调查》，都是此次研究项目中稀缺鲜有的内容。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正在编写中的科研成果，如《西藏近代史》《东乡族、裕固族历史》《畚民与瑶族的历史由来》以及为学院各系科教学单位编写的课程教材和讲稿，如《原始社会史》《中国民族志》《台湾高山族概况》《西藏喇嘛教问题》等都未及详述，但同样属于工作成绩。研究部在回顾了这两年的工作后，深深感到之所以取得上述的这些成绩，首先是在中央民委的关心指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密切与实际相结合的方针”。研究人员不管是实地调查还是搜集编纂史料，都受到了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帮助，他们派遣当地干部参加并充分协助，保证了研究工作不致脱离实际。其次，研究部的研究人员来自全国各地，大部分人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结合自己的专长，自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业务能力。这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也保证了研究工作能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再次，研究部当时研究工作的计划和项目实施，是在集体主义方针指导下，经过研究室的集体讨论决定的，指定专人负责，待研究成果初稿草就后由室内人员进行反复讨论修改达到完善，避免了过去的单干办法<sup>[12]</sup>中央民委和中央民族学院领导对研究部短时间内在所有民族研究中做出的这些成绩表示肯定，并鼓励大家再接再厉，在不断迎接新的任务面前团结一致，再创佳绩。

### 三、参加民族识别

从 1953 年开始，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摆在民族工作面前的新任务是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改善民族关系，在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改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进一步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搞好这些工作的前提，是先要弄清国内究竟有多少民族，这是摆在政府面前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历史上从未做过。过去，在历代封建统治者统治下，少数民族受到压迫和歧视，逃到偏远山区，不敢承认是少数民族。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根本不承认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把许多民族说成是汉族的“宗支”，连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五族共和”都被抹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执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长期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纷纷站出来公开他们的民族成份和名称，表现出他们已有了民族自觉。1953 年，全国开始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据当时统计，自报上来的族群名称就有 400 多个，这 400 多个族群不可能都是单一民族。从名单上看，有许多是某些民族居住的地名，有许多是某些民族内部不同分支名称或同一民族的自称和他称，有的还是不同地方的汉语译名。要答复这些族群中有哪些是单一民族或有多少民族，就需要中央和地方的民族事务机关组织队伍进行缜密的调查研究，进行一番甄别，这项工作就是我们所称的“民族识别”<sup>[13]</sup>。民族识别是一项政治性工作，也是一项十分严谨的科学研究工作，理论性、政策性都很强。初起，出于对民族工作的慎重

考虑，政府并没说在做“民族识别”，只是说在进行“民族调查”，直到1954年后才把“民族识别”这一称呼正式公开。

1953年初，中央人民政府把“民族识别”作为民族工作中一项中心工作来抓，着手组织科研力量，周密策划部署。中央了解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是汇聚民族研究科研人员最集中的地方，可以成为调查识别工作的主力，于是指示研究部派遣得力研究人员下去，挑选35人组成6支调查组，与其他学术机关研究人员相配合，分别前往西北、东北内蒙、中南、西南等民族地区展开调查<sup>[14]</sup>

如何进行调查研究，遇到的首要问题是没有理论依据可循，确定一个民族的民族成份的原则标准是什么，大家心中无数。中央领导就组织大家深入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及马克思主义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提高对民族识别的认识，把斯大林关于现代民族形成的“四大特征”作为学习和参照的理论依据。关于民族的定义，斯大林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sup>[15]294</sup>斯大林对民族定义所说的“四大特征”，指的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现代民族共同体，是“针对苏俄和欧美的情况提出的，有它原则上和实践上的指导意义”<sup>[9]179</sup>，与我国的民族构成情况有很大差别。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不能生硬照搬斯大林提出的“四大特征”，必须从我国国情和民族实际出发，根据我国民族特点和民族意愿进行，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识别过程中，要坚持理论与我国的民族现实相结合的方法，多利用我国现有的各种文献资料和各种学科的研究成果去分析判断，同时在最后确定民族成份和民族名称时做到“名从主人”，即尊重本民族意愿，不能用行政命令强加于人，又要从有利于民族团结和民族自身发展出发<sup>[16]81-103</sup>。研究部的调查人员经过学习领会了中央提出的这些精神后，开始出发至全国各地进行考察。

1953年6月，中央民委从6支调查组中派出了第一个闽浙畲民调查组前往浙江、福建等省调查畲民问题。调查组由第二研究室成员施联朱带队，组员有他在燕京大学学习时的同窗师妹凤贤、黄淑娉。在当地各级党政领导支持协助下，三人先到了浙江景宁县，第二站去了福建的罗源、漳平、上杭等三县。他们一路艰辛跋涉爬高山、越沟壑，到了漳平县畲民居住的山羊寨。这里山势陡峭，村寨几乎与世隔绝，三人用了整整一天时间才爬上山去，在村里挨家挨户做访问调查，写出了最早一份反映畲民生活情况的田野调查报告。在闽浙两省三个月的工作中，他们发现各地畲民多同族同姓聚居，都善于利用丘陵山地开垦梯田、种植稻谷，过自给自足的平静生活。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保持着独特的风俗习惯、礼仪和节日禁忌。畲民崇拜“盘瓠”，各家都保存有祖图(盘瓠图)，按时祭祖膜拜。这些特征都符合中央提出的单一民族有的“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文化上的心理认同”这些条件。于是调查组把各调查点搜集获取的材料写成综合报告，连同在此之前费孝通完成的《畲民情况》初稿、潘光旦撰写的《畲民的由来》一起提交给上级领导，为后期确认畲族为单一民族提供了充分有力的事实依据。<sup>[17]</sup>

同年8月，东北内蒙识别调查组开始出发，这个组以傅乐焕为组长，参加者有林耀华和陈雪白、王辅仁、阿勇绰克图等三位助教，调查对象是达斡尔人，识别他们是否为单一民族。调查组先来到黑龙江省的龙江、纳河两县，后去了内蒙古自治区的呼伦贝尔盟海拉尔、布特哈、莫力达瓦等达斡尔人聚居区。经过调查了解到，历史上曾有达斡尔人著书提出过“达斡尔蒙古分支说”的说法。直到1950年代，还有不少达斡尔人认为自己是蒙古族的一支。根据这一情况，调查组采取了慎重态度，先听取各地领导的介绍，利用地方政府已掌握的现成材料和召开由本民族人参加的各种类型座谈会，再从蒙古族、达斡尔人的现实民族特征人手展开比较分析，并追溯两个民族的历史源流。通过调查，初步掌握了达斡尔人的迁徙路线和发展历史。其间，傅乐焕先生根据文献记载和各调查点对达斡尔人的经济、地域、语言、宗教、文化礼俗等方面的识别认证，写出了《关于达斡尔的民族成份识别问题》。同时，林耀华、王辅仁、阿勇绰克图也写出了《达斡尔

民族、亲属和风俗习惯的调查报告》。两篇论著都刊登在研究部出版的《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一辑上<sup>[9]172-173</sup>，成为各地调查识别工作中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也是在同年8月，中央又派出两广疍民调查组前往广西、广东两省。这个调查组由杨成志带队，加上马恩惠、蔡绍庐二人组成。他们来到广西桂林、柳州、融县、钦县、合浦、北海等县再去广东的湛江、阳江、江门、广州、中山、珠海等地调查疍民身份，花了两个月时间走遍了疍民居住地，明确了他们的内河、沿海和沙田三种生活方式，开始着手编写《两广疍民社会生活调查》<sup>[18]</sup>。由于过去受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剥削，长居水上谋生，各地疍民内部联系疏远，原有语言、风俗习惯已丧失，要求承认自己的民族成份和族属认定的愿望已不强烈。据此调查组最终认定，疍民应属汉族，不应从汉族里分出成为一个单一民族。

1954年以后，民族识别工作进入全面铺开阶段，重点放在少数民族较集中地区。云南是多民族省份，在全国自报的400多个族群名称中云南就占了260个<sup>[16]</sup>，识别任务自然繁重。中央指示云南的民族识别工作要采取与其他科研单位密切配合的方法，需投入更多人力。于是派遣研究部以林耀华为组长的13位专家<sup>[1]</sup>，与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学院、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研究室等单位人员合作共同组成云南省民族识别调查组，赴文山、蒙自、玉溪、大理、丽江、普洱等六个专区，对彝、壮、傣、哈尼等不同族群展开调查。调查工作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共识别了29个族群，第二阶段又识别了39个族群，两个阶段的识别调查情况分别向上级写了初步总结报告，对这68个族群一一给予了正名<sup>[18]</sup>。民族识别过程中发现的突出问题是彝族支系繁多。人口有300多万，其中以自称“土家”“蒙化”的族群人数最多，分布在十几个县。经过识别，他们的语言与当地彝族语言基本相同，经济生活、婚姻和文化习俗都很相近，推定他们为同一个民族。经与当地干部协商，并向群众做细致入微的说服解释，顺利地将这些支系全划归了彝族当中。调查组还在文山遇到了一部分种甘蔗的人，自称“蔗园人”，人口不足千人。经过考察他们实际是从广西迁到云南富宁县讲粤语的人群，其社会文化传统皆同于汉族，经过说服教育得到他们认可同意后确定为汉族<sup>[19]</sup>。

云南民族识别调查组从1954年6月到10月，在当地工作大半年时间，参加民族识别工作的各科研单位和人员坚守共同合作的原则，特别重视与语言科学工作者的合作配合。由于共同语言是识别一个民族的重要依据，云南调查人员在工作中尤为注意这一点。经过艰苦工作，把云南上百个不同称谓的族群最后归并成了22个民族，这在当时各调查组中是十分了不起的成绩，云南的民族识别工作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民委”)的表彰。

1955年，对少数民族众多的贵州省也开始了系统的民族识别调查。1950年中央民族访问团到贵州省访问时，报上来的族群名称有80多个，民族识别调查组重点对这80多个族群进行考察研究，其中大部分初步划分了归属，还有20多个尚未最后认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单独组织识别工作队，前往贵州省西部有疑问的“穿青”“南京”“喇叭”“里民”“兜”“木佬”等十几个群体进行调查。工作队由以研究部费孝通、王静如为首的9名人员和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民族学院、贵州省图书馆等地方单位人员一起组成。工作队前往贵州安顺、毕节两专署，织金、纳雍、大定、水城、普定、镇宁等县进行调查，完成《贵州省穿青人的民族成份问题调查报告》和《关于贵州西部若干较小的民族集团初步调查资料汇综》。这两份调查报告对解决“穿青”等族群的归并和民族成份的最后落实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sup>[16]107</sup>

最后要叙述的是土家族的民族识别，经历的时间比较长。早年，分布在湘西、鄂西、川东广大地区几十万自称“毕兹卡”“密基卡”的族群，当地汉人长期把他们称作“土人”。他们究竟是汉族还是单一的少数民族很长时间没有定论。1950年，来京参加国庆典礼的湘西苗族代表团代表田心桃女士就向中央领导提出，她不是苗族，也不是汉族，叫什么民族名称，请求中央派人到她的家乡湘西进行调查<sup>[16]104</sup>。此后，当地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也提出同样的诉求，这引起了中央的重视。1952年，中共中央中南局领导委派中南民族学院的严学窘教授到土家族地区进行调研，

提交了研究报告，认为土家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土家族应是单一民族。然而这一结论未能得到湖南省委民族事务部门认可。中央为进一步搞清土家人的民族成份问题，于1953年初指派研究部第三研究室，以潘光旦先生为主领导室内同仁承担此项任务。潘先生领受任务后先组织室内人员做田野调查，派汪明瑀、胡克瑾、杨自翘等三人到湖南龙山、保靖、永顺等三县调研。调查完成后写出4万字的《湘西土家概况》，从经济生活、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民族关系等五个方面对土家人的现况作了全面介绍，同时收录了当地土家人语言，请研究室的王静如先生整理分析，完成了《关于湘西土家语言的初步意见》。这两篇文章都为土家人的族属确定打下了基础。

与此同时，潘先生开始利用文献，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辨别和选摘关于土家族的材料，参考引证各类书籍187种之多，包括史籍50种、地方志52种、笔记类30种、其他经诗文集55种，光积累土家族史料卡片就有1359张<sup>[20]</sup>。根据这些资料，最后写出了近15万字的《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一文，与《关于湘西土家语言的初步意见》《湘西土家概况》一起发表在研究部出版的《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四辑。这篇文章堪称是当代民族史和民族学的杰作，对土家人的来源和发展做出了科学解释，对土家族民族成份的最后决定提供了有力证据，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为了验证这篇论著观点是否正确无误，潘先生十分慎重，不顾自己残缺身躯的不便，前后两次深入土家人偏僻的山寨做调查核实，采用开座谈会、个别叙谈、听取汇报等方式了解土家人的自称、他称、人口聚居、语言习俗和各种传说、迁徙来源等情况，最后证明了土家既不是“蛮”，也不是瑶、苗或“僚”，而是单一民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

中央领导同志对专家们考察后写出的调研报告及潘先生论著得出的结论表示赞同和肯定，但民族成份的最后认定需要所在地方党委同意，而湖南省委个别领导和中央的意见不一致，致使土家族的民族识别工作搁置到1956年，国家民委不得不再次派遣调查组下去。这是最后一次最关键的识别调查，调查组由国家民委副主任谢鹤筹亲自带队，指定研究部的施联朱和两位从事土家语言研究的学者参加，同湖南省委的负责人一道深入土家人聚居的龙山、永顺、保靖、古丈等地，用了近4个月的时间对土家人的历史、语言、社会形态、风俗习惯及群众意愿进行更广泛深入的核实确认。通过调查组成员的多次讨论相互交流，湖南省委领导与中央调查组最后取得了共识，一致同意确认土家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报请中央批准。至此，土家族民族成份的识别经历了长达6年之久的时间，终于有了定论，

1953-1956年，三年多时间民族识别工作在全国范围基本完成，通过科学研究确定了50多个民族的民族成份。这一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工作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民族学学科发展实践活动中一项成功创举。它使过去深受民族压迫和歧视、不能承认或被迫隐瞒民族成份的许多少数民族，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关怀帮助下，通过民族识别得到了国家的正式承认，有了自己的民族名称，成为统一的民族大家庭的平等成员，从此当家作主，享受国家宪法和其他法律所赋予的各项权利。这项工作的开展改善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从而激发了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对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同样有着深远意义。

民族识别是多学科、综合性的科学研究工作，研究部几十位研究人员始终活跃在民族识别工作的第一线，充分利用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积累的知识和材料，撰写了一大批有质量的调查报告和论著，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依据。与此同时，在工作实践中，大家都提高了民族理论和专业知识水平，自身都得到了锻炼，政治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著名民族学家林耀华对此曾这样评说：“这是一代学人以爱国之心和民族平等的高尚愿望，配合政府的工作需求而作出的成绩，每位民族科学工作者都应为此感到荣光和自豪。”<sup>[9]182</sup>

#### 四、确立中国民族学四元学科结构

1956年是我国民族高等院校发展和民族研究史上有特殊意义的年份。由研究部全程参与起草、修改、审定的《关于国内民族问题和少数民族历史、语言的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综合规划(初稿)》在这一年拟定出台,而这一规划也给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在接下来十二年的学科发展和机构建设指明了方向。

1956年初,在全面发展科学技术、拟定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同时,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必须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中的重要作用。1956年2月3日,由中央宣传部牵头的《1956-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长远规划》制定工作进入准备阶段。2月3日,哲学社会科学长远规划办公室在中国科学院成立,由于此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尚未设置民族学研究的下属所<sup>[21]</sup>,中央民族学院作为少数民族研究的核心力量,共抽调研究部和语文系等部门的30多位专家参与其中。<sup>[22]</sup>

在此之前,1955年12月6日-14日,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与国家民委、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共同组织召开的“首届民族语言科学研讨会”在学校举行。会上提出和讨论了《少数民族语文工作的初步规划》,计划在1956-1958年间进行针对各少数民族语言的普遍调查,并为大部分符合条件的民族确定创立、改进和改革文字的方案,还首次提出由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与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共同组建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的构想<sup>[23]</sup>

1956年3月7日,在《少数民族语文工作的初步规划》的基础上,《关于少数民族历史人文和语文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大纲(稿)》完成<sup>[24]</sup>。后几经修改,1956年4月底《关于国内民族问题和少数民族历史、民族学少数民族语言的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综合规划草案(初稿)》提交。1956年6月12日-13日包括研究部人员在内的中央民族学院30余位专家参加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的规划座谈会,对这个方案再次提出意见并着重探讨了与相关学科密切配合的问题<sup>[25]</sup>。6月中旬,此规划草案基本定稿。

研究部参与拟定、修改和审定的这个草案明确了我国民族研究在1956-1967年内必须要完成的几个重要任务:

第一,民族问题和研究所包括的四个学科建设: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哲学;研究历史上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和少数民族历史;探讨少数民族的族别和社会性质、社会发展特点的民族学;集中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改革和语言发展的民族语言学;

第二,这四个学科研究的中心问题,即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研究;

第三,需要加强的薄弱学科和空白学科;

第四,应该在十二年内完成的重要的专门著作;

第五,十二年内应该完成的教科书;

第六,搜集、整理、编纂、出版供研究用的各种资料和工具书;

第七,整理、翻译、出版古典学术著作和近代有参考价值的学术著作;

第八,对未来十二年内所需的民族研究、教学干部的详细情况进行了估计,同时提供了培养这些干部的四项措施,即:在中央民族学院成立民族学系、历史系培养相关人才,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和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系负责培养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的研究人才和高校师资;鉴于少数民族科学研究人才数量少,应集中力量在中央民族学院办好民族学系、历史学系和民族语文系、政治系;聘请苏联专家来华讲学。此外,对向国外派遣这四个学科的留学生和研究生以做后备干部也做了初步的规划。

第九,少数民族科学研究机构的充实和设立。要以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为基础并补充部分新力量,在1959年成立包括历史与人文在内的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下设民族问题理论研究室、民族学研究室、民族史研究室等部门;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组和中央民族

学院部分研究人员为基础，补充新力量，于1956年成立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并逐步加强中央和地方已有的语文研究机构。在北京还要成立关于少数民族科学研究的编译机构，统筹翻译、编辑和出版工作。在1956-1957年间成立中央民族文物馆，以后扩充为中央民族博物馆，并对民族文物进行系统研究。

总的来说，这个草案是研究部的学者们在充分吸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工作的经验的基础上拟定的，也为全国民族问题研究和教学发展指明了方向。它结束了1949年后民族工作和研究的摸索状态，将这一领域的四元学科结构——即民族理论（哲学）、民族学、民族历史和民族语言——以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为即将成为少数民族科研中心的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的成立、最终合并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和社会历史调查奠定了制度和学科基础，也为中央民族学院的发展确定了新的目标。

## 五、组建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1956年前后，少数民族地区同汉族地区样，处于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之中各少数民族的面貌将很快发生变化。及时、迅速地完成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成为民族研究工作的一项紧迫任务。按照《关于国内民族问题和少数民族历史、民族学、少数民族语言的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综合规划草案》的设计1956-1964年，要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状况科学调查。1956年8月，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托，中央民族学院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国家民委等三个单位组成这一调查的领导核心，并由研究部负责具体业务工作<sup>[26]</sup>为集中调查少数民族社会形态，先组建了内蒙古自治区、东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云南、贵州、西藏等八个组200余人的调查队。

与此同时，以研究部为主要力量参与的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筹建工作也如火如荼地进行。1956年，中国科学院向中央宣传部和陈毅同志提出，请求以研究部为基础成立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以下简称“民族研究所”），由刘春担任所长，中央民族学院费孝通、苏克勤、翁独健、夏康农、严信民担任副所长<sup>[27]</sup>。11月7日，此意见上报中央，邓小平批示同意刘春兼任民族研究所所长<sup>[28]</sup>。

1957年3月15日，刘春向中国科学院党组提交了与苏克勤、费孝通、翁独健、翦伯赞等同志共同商谈起草的《关于筹备建立民族研究所的意见》<sup>[29]</sup>，提出了民族研究所的工作内容、人员构成（在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人员基础上建立并暂时设在中央民族学院）、副所长方案（从中央民族学院的领导中挑选）<sup>①</sup>以及筹备小组的任务四个建议。1958年4月中旬，由刘春任主任委员的筹委会向中国科学院院部呈报了有关民族研究所成立的三个文件：《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规划任务书》《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58-1967年规划（草案）》和《关于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筹备经过报告》<sup>[30]</sup>，对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在干部组建、分工协作、承继发展方面进行了十分详尽的规定。

在干部配备方面，《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规划任务书》第四点明确，民族研究所在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的基础上建立，成立之初有54名干部。《关于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筹备经过报告》提供了更详细的数字：54人中有39人来自研究部，另有由民族工作和教学工作岗位抽调的老干部和教学人员6人，1957年暑假毕业的大学生9人。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之间的关系也在《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规划任务书》中第二点被确定下来：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应保持密切分工协作的关系，民族研究所以研究为主，亦应承担一部分教学任务；中央民族学院以教学为主，亦应承担一部分研究任务。《关于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筹备经过报告》还将原研究部主办的《民族问题译丛》改由民族研究所出版，继续介绍社会主义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先进经验及有关学术著作，另外拟定出版期刊《民族研究》，作为民族研究的学术性刊物。

1958年6月23日，民族研究所正式成立大会在中央民族学院召开<sup>[32]</sup>。之后不久，7月5日，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函件，根据彭真同志的指示并商得民族研究所所长刘春同意，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领导进行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转交给了民族研究所。<sup>[33]</sup>

## 六、参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1956年3月，毛泽东主席发出指示：“**要在全国范围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争取在4至7年内，摸清各民族的基本情况，弄清他们的社会性质。**”<sup>[34]</sup><sup>56</sup>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彭真同志及时传达了这一指示。负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工作的刘格平主任，邀请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费孝通共同筹划落实这一任务。他们决定先组织调查队伍，同时组建相应的调查机构，商定把研究部的科研人员作为这次调查的主要力量，再从全国各地科研和教学单位物色人才，组成基本的调查研究队伍后，把他们集中到中央民族学院进行培训学习。此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多次请来国务院的各部委领导和国内著名的民族史、民族学专家为调查人员作报告，以提高他们的民族理论专业知识和对这次调查工作意义的认识<sup>[34]</sup><sup>57</sup>。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的科学调查，带有“抢救”性质，各科研单位和高校都非常重视。为弄清楚解放前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及阶级、生产情况，收集到各民族的历史变化和特殊的风俗习惯等资料，需在调查开始前拟定一份包括中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三种社会形态的调查提纲。这项任务又落在了研究部身上，由费孝通主持。他挑选了研究部多位资深专家学者参与草拟这份提纲。经过多次反复讨论修改，提纲顺利地完成了，分发到每个调查组手中，供他们在调查过程中去完善修订<sup>②</sup>。

调查工作是由局部的民族地区开始，逐步铺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在少数民族集中的云南、四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广东、广西、贵州、内蒙古自治区等八省区先期组成了8个社会历史调查组，定下费孝通兼任云南调查组组长，翁独健任内蒙古自治区调查组组长，冯家昇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调查组组长，李有义负责西藏调查组工作，夏康农任四川调查组组长，吴泽霖任贵州调查组组长，岑家梧任广东、广西调查组组长<sup>[34]</sup><sup>58</sup>。这样的安排再次充分显露出国家对这批老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和信任，确保了调查研究工作的科学运转。这次调查，上级还明确指示先以调查蒙古、藏、维吾尔、壮、苗、傣、彝、黎、景颇、佤、鄂伦春等20个民族为主，因为先集中起来的调查人员人数还不多，规模有限，需积累更多的调查实践经验，范围再逐步扩大。

集中在中央民族学院的调查人员，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学习和准备，于6月底开始陆续离开北京奔赴目的地。他们在当地各级党委的领导帮助下，深入到各省区偏远的村寨牧区，不辞辛苦地对20个民族展开调查。不到两年时间，搜集整理出来的资料近1500万字<sup>[35]</sup><sup>279</sup>。在了解各民族、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形态、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禁忌礼仪后，他们初步撰写出一批不同类型的调查报告，对未来民族研究工作的开展均有重要参考价值。以云南调查组为例，经过两年的深入调查，共完成傣、佤、景颇等民族专题调查报告十余份，仅《傣族社会历史调查》一项汇集起来的资料就有10册，字数达百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将这些资料内部印行，作为云南调查组前期最早的研究成果<sup>[36]</sup><sup>12</sup>。其他各省调查组也同样有不同类型的调查成果问世。

进入1958年，中央颁布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全国进入“大跃进”时代，民族研究工作顺应形势需要也做了调整。6月11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主持下，联合中国科学院、中央民族学院等单位，在京召开了民族研究工作科学讨论会，提出《民族研究工作跃进规划》<sup>①</sup><sup>[37]</sup><sup>30-35</sup>，要进一步推进和扩大民族研究规模。6月23日，民族研究所将原来组成的8个社会历史调查组扩大为16个<sup>②</sup>，组织动员更多的人力参加调查。除了新成立的民族研究所的干部外，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中央革命博物馆等单位的研究与教学人员都参加了进来，人数最多时达到 500 人<sup>[38]286</sup>，仅中央民族学院的各族师生就有 336 人参加<sup>(3) [39]</sup>。上级决定，今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改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新组成的领导班子主持领导，将研究部研究人员做了重大调整，除 1956 年调到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任教的部分人员外，其余人员有 39 人全划归民族研究所的编制管理中自此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实际已经解散。

尽管科研人员已被划归不同单位，但他们在国家统一下达的科研任务中仍是一个完整的无法分割的团体。不管是调查工作，还是后来民族史志的编写，他们始终融合在一起，共同研究探索，相互协作。他们被分配到各省区的调查组内，成了各调查组的核心骨干。他们深入民族地区的最底层，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严守纪律，昼夜奋战，圆满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各项调查任务。与此同时，中央又提出另一项任务，就是要调查组一边调查，一边编写“三套丛书”。所谓“三套丛书”，指的就是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中国少数民族简志和民族自治地方概况。这三本书的编写是给民族研究工作者提出的新任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民族研究和民族文化建设中未曾有过的一项重大工程。原研究部的大部分人员与各高校学识渊博的一批专家一起投入了这项工作，成了编写各民族简史、简志的主要召集人和撰稿人<sup>④</sup>。到 1963 年下半年，“三套丛书”中的简史和简史简志合编初稿基本写就，同时积累起来的调查资料也有 340 多种，计 2900 多万字，还拍摄了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十余部。遗憾的是后来由于连续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调查者和撰稿人陆续回原单位，“三套丛书”中那些尚不完善的稿本和调查资料未能得到及时修订完善，也没有正式出版。人们把这些没有公开出版的“三套丛书”称作“白皮书”。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没有人再来过问此事，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情况才有了转机。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国家民委正式恢复工作。1979 年 1 月，杨静仁主任主持下，国家民委在京召开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次的民族工作规划会议。会议决定将“文化大革命”前编写的“三套丛书”扩充为“民族问题五种丛书”<sup>①</sup>，在原有“三套丛书”基础上，增加了《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三本书，并推动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编写列入了国家“六五”规划的重点科研项目。国家民委非常重视这项宏大的民族文化建设工程，组建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委员会主任由杨静仁亲自担任，副主任是江平和伍精华同志，吸收了在京的著名专家费孝通、翁独健、牙含章、秋浦、傅懋勤、白寿彝等担任顾问和参加丛书的编辑审定工作。显然，这次编写的任务十分繁重，动员了全国各地的民族科研工作者共同参与。经过大家十几年的一致努力，“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编著工作终于在 1992 年全部完工。据当时“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办公室发布的初步统计数字，初期共出版了 403 本，发行 183 万册，字数达到亿万多字<sup>[40]285</sup>。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部最大规模、完整介绍中国民族历史文化知识的百科全书，是近千名科学工作者心血的结晶。它的出版受到了各族人民的欢迎，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这是全体民族研究工作者在改革开放后的新时代迎来的又一次胜利！

## 七、结语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的主要工作从 1952 年创建开始到 1958 年，共延续了六年时间。在这短短时间里，研究部不但将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四元学科结构以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而且协助组建了民族学研究的最高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为民族学的学科研究发展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少数民族大调查奠定了学科和制度基础。不仅如此，研究部的科研人员通过参加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等一系列民族工作实践活动，提高了思想觉悟，积累了民族工作经验，撰写了大量内容详实的民族学、民族史方面的著作，为我国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了自身的力量。

从中央民族大学收藏的档案中还可以看到这样的记录：“截止1958年，研究部历年写出的论文资料累计159篇，约590余万字(参加各个调查组写出的资料除外)，出版了《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共六辑，《中国民族问题研究丛刊》两集，包括论文资料40篇，约160余万字。此外，还发行了《民族问题译丛》四卷30期民族问题译丛丛书共12种。”<sup>[41]</sup>他们所成就出来的这些科研成果是建校初期的奠基之作，属于中央民族大学的宝贵文化财富。老专家们在工作中表现出的奉献精神和锲而不舍、脚踏实地的治学作风，以及对民族研究事业的执着是我们认真学习的榜样。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走过的历史和学术贡献是中国民族学发展壮大历史中不能缺少的组成部分，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 参考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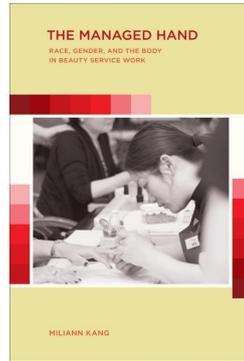
- [1]关于筹办中央民族学院的方案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件[A].中央民族大学档案馆藏(内部资料)1950:43-1.
- [2]研究部组织情况及组织系统表等材料[A].中央民族大学档案馆藏(内部资料)1954:15-26.
- [3]研究部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及行政人员分类统计表[A].中央民族大学档案馆藏(内部资料)1954:15-26.
- [4]1954年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工作总结提纲(草稿)[A],中央民族大学档案馆藏(内部资料)1954:15-25.
- [5]研究部工作人员名单[A].中央民族大学档案馆藏(内部资料)1954:15-26.
- [6]研究部机构调查表及方针任务与意见等材料[A].中央民族大学档案馆藏(内部资料)1954:15-19.
- [7]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的工作[A].中央民族大学档案馆藏(内部资料)1954:15-4.
- [8]研究部出版稿件初步估计[A].中央民族大学档案馆藏(内部资料)1953:15-2.
- [9]林耀华,林耀华学述[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 [10]研究部两年来的研究工作内容[A],中央民族大学档案馆藏(内部资料)1954:15-4.
- [11]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简单介绍[A].中央民族大学档案馆藏(内部资料)1954:15-4.
- [12]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工作总结提纲(草稿)[A],中央民族大学档案馆藏(内部资料)1954:15-25.
- [13]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80(1):147-162.
- [14]研究部调查工作表[A],中央民族大学档案馆藏(内部资料),1954:15-4.
- [15]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M]//斯大林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94.
- [16]黄光学、施联朱,中国的民族识别:56个民族的来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 [17]关于畚民是否系一种少数民族问题的意见[A],中央民族大学档案馆藏(内部资料),1952:15-1.
- [18]研究部统计表[A],中央民族大学档案馆藏(内部资料),1956:15-22.
- [19]林耀华,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J],云南社会科学,1984(2):1-5.
- [20]全国科学研究机构调查表研究工作情况[A].中央民族大学档案馆藏(内部资料),1954:15-6.
- [21]哲学社会科学长远规划办公室在中国科学院成立[A]//中国科学院史料汇编(1956年),中国科学院藏(内部资料),1999.
- [22]研究部通讯组,哲学社会科学长远规划中确定民族问题和少数民族历史、民族学、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方向:我院三十余位专家参加规划座谈会[N],中央民族学院院刊,1956-07-01(3).
- [23]关于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和民族语文工作初步规划的报告[A]//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6),中国科学院藏(内部资料),1999.
- [24]关于少数民族历史、人文和语文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大纲草稿[A],中央民族大学档案馆藏(内部资料),1954:15-6.
- [25]苏克勤,回顾一年间[N].中央民族学院院刊,1956-06-09(2).

- [26]张养吾, 编纂《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文库之三:概览篇[M]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4.
- [27]院党组关于增设社会科学方面研究机构的请示报告[A],中国科学院藏(内部资料), 1956:1956-1-1.
- [28]中国科学院党组致刘春同志信[A], 中国科学院藏(内部资料), 1957:1957-1-1.
- [29]关于筹备建立民族研究所的意见[A]//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7年).中国科学院藏(内部资料), 1996.
- [30]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给中国科学院的报告[A],中国科学院藏(内部资料),1958:1958-02-003-11
- [31]关于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筹备经过的报告(附报告、工作计划等)[A], 中国科学院藏(内部资料), 1958: 1958-02-003-11.
- [32]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正式成立[N].中央民族学院院刊, 1958-06-24(2).
- [33]关于民族研究所接管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的函[A], 中国科学院藏(内部资料), 1958:1958-03-012-01.
- [34]王昭武, 中央首长为我们壮行[M]//揣振宇、华祖根、蔡曼华, 伟大的起点: 新中国民族大调查纪念文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57.
- [35]记民族研究工作科学讨论会的经过[M]//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下册:文献资料选编,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8: 279.
- [36]马曜, 记建国初期云南民族调查[M]//郝时远, 田野调查实录: 民族调查回忆,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12.
- [37]民族研究工作跃进规划[M]//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民族研究工作的跃进, 北京: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8
- [38]新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五百人员已分批离京前往各民族地区[M]//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下册)文献资料选编,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8: 286.
- [39]参加社会历史调查名单[A].中央民族大学档案馆藏(内部资料).1958: 36-91.
- [40]马寅, 马寅民族工作文集[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5: 285.
- [41]中央民族学院七年来工作总结[A].中央民族大学档案馆藏(内部资料), 1958: 43-91.

## 【网络文章】

## 《受控之手：美容服务工作中的种族、性别与身体》

米莲·康（Miliann Kang）著，加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



### 书籍简介：

两名毫无交集的女性坐在狭窄的桌子两侧，手牵着手，共同专注于同一个目标——打造完美的美甲。这种接触在美国的美甲沙龙中发生了数千次，这些沙龙越来越多地由亚裔移民所有和经营。本研究首次深入研究了这些亲密接触，并重点关注纽约市：这里的美甲沙龙无处不在。

通过丰富且引人入胜的访谈，米莲·康（Miliann Kang）带领我们深入了解了美甲行业，提出了以下问题：为什么美甲沙龙变得如此受欢迎？为什么有这么多亚裔女性，尤其是韩裔女性，提供这些服务？康发现了美甲的多重动机——从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娇生惯养到工人阶级非裔美国女性的自我艺术表达，再到与身体相关服务的大众消费。

与将美容服务场所视为建立女性社群空间的观念相反，《受控之手》发现，虽然在美甲桌上可能会出现带有试探性且脆弱的团结，但它们往往会让位于更加强大的种族、阶级和移民之间的分歧。

本书获得了：

——由美国社会学协会种族和少数民族分会颁发的“奥利弗·克伦威尔·考克斯奖”（Oliver Cromwell Cox Award）

——由美国社会学协会种族、性别和阶级分会颁发的“学术图书杰出贡献奖”（Distinguished Contribution to Scholarship Book Award）

——由美国社会学协会性社会性别分会颁发的“杰出图书奖”（Distinguished Book Award）

——由全国妇女研究协会颁发的“莎拉·惠利图书奖”（Sara Whaley Book Prize）。

**作者简介：**米莲·康（Miliann Kang）是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女性研究助理教授，以及社会学和亚洲/亚裔美国人研究的附属教职工。她研究亚裔美国人的女性主义、移民妇女的工作和劳工问题、种族和生殖政治，以及跨国背景下的性别、工作和家庭问题。她的专业领域包括女性主义民族志研究、女性主义课堂和公众参与的研究中的冥想教学法，以及大学中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努力。

**书籍介绍：**在《受控之手：美容服务工作中的种族、性别与身体》一书中，康对包括美甲在内所涉及的身体工作进行了彻底的研究和细致分析。这一研究提供了一个交叉性的、具身的（embodied）视角，审视沙龙从业者、美甲技师及其顾客所经历的劳动。在简要地将其研究置于性别化劳动移民（gendered labor migration）、美的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 of beauty）和身体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body）的实证文献中后，康探讨了性别化身体劳动的实践（gendered practice of body labor）。

康的数据基于对纽约市三种不同类型的韩裔美甲沙龙进行的广泛民族志研究，历时 10 年。她的分析集中在每种类别中的两家不同的沙龙，这三类沙龙包括：（1）为白人中上阶层女性提供服务的高档沙龙；（2）主要为工薪阶层非裔美国女性提供服务的美甲沙龙；（3）为多样化的客户提供基础修甲服务的折扣沙龙。

这种研究设计为她的分析增添了对比深度，并将交叉视角置于显著位置，因为我们能看到美容服务劳动的互动是如何同时受到性别、种族、阶级和移民身份的影响。尽管进行这种交叉性分析可能会很困难，但康成功地用一种连贯而细致的方式处理了这些社会分化问题。即使她的信息报道人将其经验归结为仅一种类别（例如仅关于种族，或仅关于性别），康还是能够巧妙地引导我们注意这些多重的区分是如何同时起作用的。最后，我们持续关注“身体”，并产生这样的疑问：有关身体的服务工作与其他类型的劳动有何不同，以及工作者和顾客的身体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受到规训。

作者在书中并没有提供单独的理论章节，而是在整个文本中融入了构成她分析基础的核心理论。她对社会理论的运用尤其有效，因为她成功地将理论与信息报道人的声音编织在一起。康首先借鉴并延伸了霍克希尔德（Hochschild）在《受控的心灵：商业化的人类情感》（*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中介绍的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理论。霍克希尔德从一个马克思主义问题开始：从自己的情感中被异化或被疏离意味着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根据资本的要求产生或抑制情感，是为获得工资而出售它们。虽然情感劳动可以出现在不直接涉及身体工作的职业中（例如空中乘务员），但康提出反向关系并不成立。她认为，我们不应该在理论上将身体服务工作中的体验和情感劳动分开，而应将它们视为相互交织的（情感劳动被视为身体劳动的一部分）。

在第三章中，顾客成为关注重点，客户对美甲过程和他们修饰后的指甲赋予各种意义。在这里，康有效地运用了布迪厄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概念来分析美甲风格阶级化和种族化的审美判断，并将这一理论引向交叉性方向。

第四章重点关注高档沙龙，康借鉴了福柯关于温驯身体（*docile bodies*）的概念，认为在美甲的互动/身体工作过程中，美甲工作者和顾客都受到了规训。许多顾客谈到修指甲让她们“感觉更女性”化（*feel more feminine*），作者对这种“感觉女性化”的经验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指甲的外观上，康氏巧妙地将其与有关美的种族化/阶级化的标准联系起来。

在大多数想要向上流动的移民梦想被粉碎的背景下，美甲桌上的情感交流让读者产生了共鸣：读者熟悉其他类型的身体工作（如保姆、护士、美发师），但同时美甲在重要方面又与它们有所不同。康所研究的三种类型的美甲沙龙分别要求美甲师进行不同类型的身体劳动，分别被她标签为纵容型（*pampering*）、表达型（*expressive*）和惯例型（*routinized*）。这种分析的优势之一是，在美甲师的经验中，我们能够看到这些不同类型的身体劳动各自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异化的。

第四章有关高档沙龙的内容尤其具有启发性（同时也令人不快），因为我们看到移民美甲师在进行涉及身体/情感工作时，需要忍受并独自消化自己上升通道阻塞的沮丧，以便为白人特权客户提供所需的尊重、纵容和言语关注。在这一章中，康将这些客户的期望与本质主义的东方主义话语（*essentialist Orientalist discourse*）联系起来，这种话语认为亚裔女性具有进行这种服从性身体劳动的天赋（并真正享受此类工作）。我们还看到，精英客户对高品质的美甲以及对恭敬态度的需求与亚裔作为模范少数族裔的话语息息相关，白人客户愿意承认亚洲人在特定技术专业领域的优越性，却不愿意承认他们自己在地位平等方面的优越性。

在第五章中，康探讨了主要为黑人工薪阶层客户提供服务的美甲沙龙。在这里，美甲师不再需要进行纵容型的身体劳动，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被要求需要具有高水平的艺术技能。同时，沙龙经营者和工作人员也必须愿意公开展示对社区的尊重。在第四章中，明显可以看出纵容型的身

体劳动可能会增加工作者的异化感，而黑人工薪阶层客户对艺术创造性方面的期望可能会减轻这种劳动的异化。虽然康并没有明确提出这一点，但她的分析似乎表明，在这个社区工作的情感劳动价值更多地围绕着调和种族紧张关系的紧密义务和被视为“回报”社区展开，而不是对高水平的艺术技能的期望。

在关于折扣美甲沙龙的第六章中，我们看到了第三种类型的美甲——即惯例型的身体劳动——的动态。尽管人们可能会认为这种类型的美甲（因为它是“折扣”）需要的情感劳动最少，但康的研究表明，在 20 分钟内完成一次完美的美甲的同时不打破情感规则、不表现出匆忙或急切，会产生显著的焦虑。此外，我们还看到沙龙经营者需要进行十分重要的情感劳动，以调解和掩盖各种不信任的客户，同时安抚客户对及时服务的需求。不同经济地位的女性在同一空间内活动，受到同一工作者的触摸，这种张力令人痛苦。康通过“黄祸”（yellow peril）话语反映出了这些焦虑，尽管讽刺的是，客户对卫生的焦虑似乎更多地针对彼此（即被视为“低阶层”的人）而不是经营者或工作人员的种族/移民身份。然而，由于折扣沙龙与韩国人所有有关，康认为会引发“黄祸”话语。

康的研究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将身体纳入到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的“情感劳动”研究范畴中：这项工作涉及到对工作者和消费者情绪的管理。第二个重要贡献是其交叉性视角框架：美容工作越来越依赖于有色移民女性的劳动，康在分析中巧妙地整合了移民、性别、种族和阶级等类别，并分析了工作者与顾客之间的关系如何受到更大的结构性力量和有关性别、种族和移民的话语的影响。

本书是对相关领域的一项宝贵贡献，并有着广泛的受众。它将吸引具身（embodiment）研究者，尤其是那些对工作与身体交叉感兴趣的人。鉴于其高度易读的写作风格（十分引人入胜），以及与各种理论文献的联系，再加上丰富的民族志细节，这本书适用于社会学（尤其是性别、情感、工作和移民社会学）、妇女研究和民族研究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

#### 本文采编整理自：

Powers Albanesi, H. 2012. The Managed Hand: Race, Gender, and the Body in Beauty Service Work. *Social Science Journal* Vol.49(2), 247-249

Choy, C. C. 2012. The Managed Hand: Race, Gender, and the Body in Beauty Service Work.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99 (1)

#### 延伸阅读：

Duffy, M. 2011. *Making care count: A century of gender, race, and paid care wor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关怀的重要性：性别、种族与有偿照顾工作的百年历程

Gimlin, D. 2002. *Body work: Beauty and self-image in American culture*.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身体劳动：美与自我形象在美国文化中的表现

Hagan, J., Hernández-León, R., & Demonsant, J. L. 2015. *Skills of the unskilled: Work and mobility among Mexican migrants*.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无技能者的技能：墨西哥移民的工作与流动性

Otis, E. M. 2011. *Markets and bodies: Women, service work, and the making of inequality i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市场与身体：中国妇女、服务工作与不平等的塑造

（编译：廖敬霖，责编：吕想，排版：胡琼）

\*\*\*\*\*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1 期-第 404 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hehui.pku.edu.cn/second/index.aspx?nodeid=1820>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

---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